

## ※「當前道教材料的發現、編纂及問題」專輯※

# 《道藏輯要》與《重刊道藏輯要》 所收道教經書的比較——兼論趙宗誠 〈《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一文的錯誤

黎志添\*

### 一、前言：《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 的研究回顧

目前對清代嘉慶年間由北京覺源壇弟子蔣予蒲(1756-1819)<sup>1</sup>編纂的大型道教叢書——《道藏輯要》的研究，以義大利籍學者莫尼卡(Monica Esposito, 1962-2011)的貢獻最為突出；她為《道藏輯要》的研究方法和發展方向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礎。二〇〇六年，莫尼卡的「《道藏輯要》研究計畫」首先獲得臺灣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之後於二〇〇七年，又取得日本學術振興會共四年的研究經費支持。二〇一一年三月，莫氏因為心臟病復發，不幸在日本京都病逝<sup>2</sup>。莫尼卡為研究《道藏輯要》發表過兩部專著，而相關的學術論文共有十篇之多<sup>3</sup>。

\* 黎志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sup>1</sup> 蔣予蒲，字元庭，道號惠覺，又號夢因和廣化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進士，並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七年(1782)，被任命為《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關於蔣予蒲的生平資料，另參〔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94補錄，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146冊，頁160-163；〔清〕紀昀編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第1冊，頁26-32。

<sup>2</sup> 自2012年起莫尼卡的《道藏輯要》研究計畫已交由香港中文大學黎志添教授及其主持的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負責執行及完成。現正出版中、英文兩套《道藏輯要》的研究提要文集。此項研究計畫獲得六十多位國際道教學者的支持和參與。

<sup>3</sup> 2011年(2013年刊印)，*Cahiers d'Extrême-Asie* (法國遠東學院出版的漢學期刊)第20期整理

研究嘉慶版《道藏輯要》，不能與後來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完成編纂的《重刊道藏輯要》分割。莫尼卡的研究貢獻，正是在於將這兩部清代道教叢書的流傳和各種版本關係結合起來分析。首先，根據目前可以找到的分藏於中國、日本、臺灣及法國各大圖書館中的十三套嘉慶版《道藏輯要》(另加上一九二二年丁福保〔號守一子，1874-1952〕《道藏精華錄》所收載的〈道藏輯要總目〉<sup>4</sup>)，莫尼卡仔細地比較並發現各種版本所收入道經的數目、冊數、卷數，以及道經編排的次序都有不同<sup>5</sup>。除此十三套之外，筆者亦發現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

了莫尼卡的學術生平及其學術出版目錄(頁vii-xxiv)。除了錄入其中的8篇論文的出版記錄外，莫尼卡另外還有2篇學術會議論文均與研究《道藏輯要》有關，包括有：《〈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發表於高雄中山大學2006年11月11-12日舉辦的「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未刊論文，但可於以下互聯網址下載：[http://www.daozangjiyao.org/DZJY\\_C/Daozang\\_Jiyao.html](http://www.daozangjiyao.org/DZJY_C/Daozang_Jiyao.html))，以及〈清代全真教之重構：閔一得及其建立龍門正統的意願〉，發表於香港道教學院2010年1月6-8日舉辦的「探古監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國際研討會。有關莫尼卡《道藏輯要》研究的相關學術論文如下：

モニカ・エスポジト(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07年)。莫尼卡：〈一部全真道藏的發明：《道藏輯要》及清代全真認同〉，趙衛東主編：《問道崑崙山——齊魯文化與崑崙山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頁17-27。モニカ・エスポジト(莫尼卡)：〈清代道教における三教の寶庫としての『道藏輯要』——在家信徒と聖職者の權威の對峙〉，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渉論叢續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1年)。莫尼卡：〈清代全真三壇大戒儀式的創立〉，《全真道研究》，2011年第2期，頁204-220。

Monica Esposito, "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anting's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A Presenta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Qing Dynasty," 麥谷邦夫編：《江南道教の研究》(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 1 (2009): 95-153. Monica Esposito, "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 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in Liu Xun and Vincent Goossaert, eds.,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3).

<sup>4</sup> 丁福保編：《道藏精華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冊，頁467-482。

<sup>5</sup> 參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p. 95-153, especially 131-144;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57。例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有268冊，33函；東洋文庫藏本有218冊，28函；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有185冊，無函；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有200冊，30函；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本有219冊，無函；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本有211冊，無函。

南京大學圖書館亦各自藏有一套《道藏輯要》。合計起來，至今被發現傳世的嘉慶版《道藏輯要》共有十六套藏本（見表一）。可以說，自嘉慶十年（1805）蔣予蒲及其覺源壇同門弟子接受呂祖孚佑帝君（以下統稱呂祖）的降乩，開展編纂《道藏輯要》的工作以後<sup>6</sup>，迄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蔣予蒲辭世之前，把《道藏輯要》經板從北京移送至蘇州存放的這段時間，《道藏輯要》確實流傳了不同的刻印版。而這種複雜的版本差異情況亦造成目前學術界研究《道藏輯要》的困難和障礙。

以成都四川省圖書館藏的嚴雁峰（1855-1918）本《道藏輯要》為例（以下簡稱成都嚴雁峰本），該藏本收入四篇序文，包括有：呂祖〈序〉、觀音大士〈弁言〉、鍾離權〈序〉和大羅真人蘇朗〈序〉；而其他十五套《道藏輯要》藏本，只收入一篇或兩篇序文。藏於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京都人文本）、北京白雲觀和法國高等漢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巴黎本）的三個藏本都收有蘇朗〈序〉和鍾離權〈序〉；日本東洋文庫、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和南京大學圖書館的藏本就只有一篇蘇朗〈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藏本則只收有一篇鍾離權〈序〉。

對於各種《道藏輯要》藏本之間不同地方的比較，莫尼卡和她的研究團隊成員（包括垣內智之和池平紀子）已做出了十分詳盡的梳理和分析，茲不贅述<sup>7</sup>。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終存放在蘇州的《道藏輯要》經板至少被編纂者重刻過一次。並且，這個較晚的增補本（以下稱江南增補本）添加了兩部在湖州金蓋山呂祖道壇造構出來的呂祖道經，即是：《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在傳世的嘉慶《道藏輯要》藏本中，有八套收錄了這兩種出於湖州金蓋山的呂祖道經，分別編入《道藏輯要》「箕集十」和「箕集十一」之中，包括：北京白雲觀、北京大學圖書館、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法國高等漢學研究所、

<sup>6</sup>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卷1，蘇序頁6a-b：「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代天宣化，變現十方，網維三教。凡所著述，一字一言，胥玄府之總持，大羅之密諦。今乃囊括後先，條貫今始，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真之典要，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付諸剞劂。」除特別註明之外，本論文依據的《道藏輯要》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

<sup>7</sup>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p. 118-145; 垣內智之、池平紀子合著：〈道藏輯要版本考〉，麥谷邦夫編：《「道藏輯要と明清時代の宗教文化」研究報告書》（2012年，非賣品），頁273-441。

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柏克萊大學圖書館及南京圖書館等藏本。據莫尼卡的推測，有可能是蔣予蒲在辭世前寓居杭州的三年間(1816-1819)，將這兩部呂祖道經編入存放在蘇州的《道藏輯要》經板之內，並再增刻刊行<sup>8</sup>。

雖然，對於江南增補本《道藏輯要》何時收入「箕集十」《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箕集十一」《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的問題，仍須進一步探究<sup>9</sup>，但莫尼卡的研究成果已經充分證明各種《道藏輯要》的傳世藏本都是出於編纂者蔣予蒲，並且，可以確證嘉慶年間流傳了至少六套冊數不同的《道藏輯要》版本<sup>10</sup>。然而，對於在嘉慶版以前，有否存在更早的康熙年間由彭定求(1645-1719)輯成的《道藏輯要》的看法，莫尼卡卻持否定的看法，她說：「通過對現存《道藏輯要》版本的研究，我也認為〔康熙〕彭定求編集了第一個版本的說法完全是臆造的，事實上不存在這樣一個版本。」<sup>11</sup>

除了對現存蔣予蒲本《道藏輯要》的各種不同版本做出全面的比較研究之外，莫尼卡又對《道藏輯要》收錄的道經做了大量系統的分類及考證工作；她清晰地辨明了《道藏輯要》所收錄的道經與明代《道藏》的關係。這方面豐富的研究成果大大修正了過去吉岡義豐、翁獨健、趙宗誠等學者的說法。尤其重要的是，莫尼卡具說服力地指出，過去學者對《道藏輯要》收錄多少部道經這問題所提出的說法均是錯誤的。例如，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的第一章——〈道藏編纂史〉提出蔣予蒲本《道藏輯要》乃是從明代編修的《道藏》中選錄一百七十三種道經，並說：蔣

<sup>8</sup> 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20：「『巴黎版』可能完成於1816年之後。」

<sup>9</sup> 丸山宏認為《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成書的時間應該是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蔣予蒲去世之後。見丸山宏：〈清朝道光年間金蓋山呂祖道壇所創造之經典初探：以《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為中心之探討〉，《道教研究學報：宗教、歷史與社會》第7期(2015年)，頁171-200。

<sup>10</sup>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 150. 此6種不同版本，依次為日本東洋文庫藏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本、成都四川省圖書館藏嚴雁峰本、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以及包括「箕集十」和「箕集十一」的江南增刻板（以法國巴黎高等漢學研究所藏本為代表）。

<sup>11</sup>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3；Monica Esposito, *Creative Daoism* (Wil/Paris: UniversityMedia, 2013), pp. 182-187.

氏新增收入九十六種為《道藏》未收的道經。吉岡義豐認為，嘉慶版《道藏輯要》收入道經的總數為二六九種<sup>12</sup>。吉岡義豐並沒有為他這種有關《道藏輯要》裏所選收明代《正統道藏》的道經（以下簡稱「藏內道經」）和《正統道藏》未收道經（以下簡稱「藏外道經」）的數目之說法提供充分、可信服的文獻證據。可惜的是，柳存仁於一九七三年發表的有關《道藏》的研究文章卻直接引用吉岡義豐對《道藏輯要》的說法<sup>13</sup>。

比日本吉岡義豐更早留意《道藏輯要》新增道經數目問題的學者，有燕京大學教授翁獨健(1906-1986)。在其於一九三五年由哈佛燕京學社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中，翁獨健附錄了由他撰成的〈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sup>14</sup>。可惜的是，翁獨健所依據的《道藏輯要》版本只是成都二仙庵編纂的光緒版《重刊道藏輯要》。除了計入由《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新增的二十三種「道經書目」外，翁獨健稱《重刊道藏輯要》實收九十一種新增的藏內、外道經。由於翁氏未能利用嘉慶版《道藏輯要》來校證《重刊道藏輯要》，他其實不能區分出在新增的九十一種藏內、外道經中有多少部已收入嘉慶版《道藏輯要》裏，然後又有多少部為光緒版《重刊道藏輯要》所增收。因此之故，筆者認為，〈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對比較研究《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沒有太大的幫助。不僅如此，更大的問題是，〈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所抄出的九十一種新增藏內、外道經的數目亦不準確。據筆者研究，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少收了十三種為嘉慶版《道藏輯要》增收的藏外道經，但又收入了十種為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新增的藏外道經。然而，如下文所證，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新補的藏內和藏外道經共為十四種。本論文第二部分將會詳細分析翁獨健對《道藏輯要》新增道經數量的錯誤結論。

一九九五年，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趙宗誠撰成〈《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一文，影響很廣，一直至今，很多研究《道藏輯要》的學者仍然引用趙文錯誤

<sup>12</sup> 吉岡義豐：《道教經典史論》（東京：道教刊行會，1955年），頁176。

<sup>13</sup> Ts'un-Yan Liu, "The Compila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Tao-tsang*," in Donald D. Leslie, Colin Mackerras, Wang Gungwu, eds., *Essays on the Sources of Chinese History*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1973), p. 108.

<sup>14</sup> 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翁獨健編：《道藏子目引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重印），頁38-40。另參翁獨健：〈道藏子目引得序〉，頁i-iii；陳振文：〈《道藏子目引得》之得失〉，《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1期（2014年2月），頁87-93。

的判斷和結論。例如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第四卷（1995年修訂本）以及卿氏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為四川巴蜀書社出版的十冊縮印本《重刊道藏輯要》所撰成的序文，卿氏幾乎完全摘錄和直接引用趙宗誠的錯誤說法，即：蔣予蒲本《道藏輯要》所收的道書數目，「即為原有彭定求從《道藏》選出的二百種，加上新補的七十九種，共為二百七十九種」<sup>15</sup>。趙宗誠論斷的問題在於：他提出一種缺乏原始文獻證據支持的臆測，例如說：「這位自稱守綱道人的彭定求，並在明本《道藏》中，精選出道書二百種，編成叢書，按二十八宿字號，分為二十八集……。因為是從《道藏》選出重要道書編纂而成的道經叢書，故總名之為《道藏輯要》。」<sup>16</sup>然而，如莫尼卡所證明，根本不存在有一個比蔣予蒲本更早的在康熙年間由彭定求編成的《道藏輯要》本。因為建立在錯誤的論斷基礎之上，趙宗誠提出彭定求本《道藏輯要》收有二百種藏內道經的說法，亦不準確，缺乏事實根據。據筆者推算，雖然《重刊道藏輯要》最後確是收入了二百種藏內道經，但此事要待民國六年由《重刊道藏輯要》的二仙庵編纂者來達成這個數目。故此，筆者十分同意莫尼卡的基本判斷：《道藏輯要》不可能是出於彭定求編纂的原意和成果。

進一步而言，趙宗誠一文對嘉慶蔣予蒲本《道藏輯要》做出更嚴重的誤判是他提出以下的結論：「到了嘉慶（1796-1820）年間，有好道之士蔣元庭〔案：即蔣予蒲，字元庭〕，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共七十九種。」<sup>17</sup>雖然趙宗誠一文羅列了七十九種據稱是蔣本《道藏輯要》增加的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後新出道書（本文稱「藏外道經」），但是七十九這個道書數目同樣是趙宗誠的誤斷。其錯誤之處在於趙指出的七十九種道書，雖然其中有七十五種道書為藏外道經，但是其餘三種道書是屬於明本《道藏》所收入的道經（包括：《至真歌》[DZ 1257, 2. 4b-7a; DZ 1085, 3b-6a]、《西川青羊宮碑銘》[DZ 964]、《華蓋山浮邱、王、郭三真君事實》[DZ 778]，DZ 編號為藏內道經，根據《道藏通考》排序），因此，它們屬於「藏內道經」，所以不能把這

<sup>15</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四川文物》，1995年第2期，頁29。在2010年，趙文又再被收錄於蓋建民編：《開拓者的足跡：卿希泰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頁62-68。另參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卷，頁458；卿希泰：《〈重刊道藏輯要〉縮印本序》，《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2期，頁1-2。

<sup>16</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27。

<sup>17</sup> 同前註。

三種藏內道經說成是「明本《道藏》失收道經」或「新出道書」。此外，還有第四種藏內道經——《五篇靈文》是遲至一九〇六年才為《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新增的藏內道經。

跟翁獨健存在一樣的方法問題，趙宗誠提出「蔣予蒲《道藏輯要》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後新出道書為七十九種之數」的說法，就是沒有利用嘉慶版《道藏輯要》作為其考證和比較的依據。相反，筆者以京都人文本作為依據，即發現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的總目錄收有二百六十九種道經書目，其中有一百八十六種屬藏內道經，八十三種為藏外道經。對比京都人文本所收的八十三種藏外道經與趙宗誠一文所列出的七十五種新出道書目錄（不包括《至真歌》、《西川青羊宮碑銘》、《華蓋山浮邱、王、郭三真君事實》、《五篇靈文》等四種藏內道經），我們立即可以發現趙宗誠的新出道經書目有錯誤和闕漏。

趙宗誠解釋他之能夠得出「蔣予蒲《道藏輯要》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後新出道書共為七十九種之數」，乃是建立在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的計算基礎之上。趙稱：

當代學者翁獨健先生，於一九三五年編《道藏子目引得》時，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他將《重刊道藏輯要》書目同明《道藏》書目核對，清理出〈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共有一百一十四種道經和道經書目，作為《道藏子目引得》的附錄，介紹給讀者。我們根據這個〈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與《道藏精華錄》所收蔣元庭編〈道藏輯要總目〉查對，發現了蔣元庭本《道藏輯要》新增道經七十九種，閻永和等《重刊道藏輯要》新增道本（含道書書目）四十種，從而也就明白了彭定求開初編纂《道藏輯要》時，從《道藏》內輯出的重要道經為二百種。<sup>18</sup>

從以上的引文，可以知道趙宗誠一文能夠得出蔣本《道藏輯要》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後新出道書的數目，只是直接引用了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的錯誤數據。這正是趙文問題癥結之所在。除了直接引用〈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趙文繼而將〈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與丁福保(1874-1952)《道藏精華錄》所收〈道藏輯要總目〉（丁福保未有註明是依據哪個嘉慶版本）作比較<sup>19</sup>。由於

<sup>18</sup> 同前註，頁 31。

<sup>19</sup> 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道藏精華錄》，第 1 冊，頁 467-481。

〈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所列《道藏輯要》的藏外道經數目不準確，以及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亦存有版本未清的缺點和限制等缺陷，因此，我們可以總結說：由這種缺乏使用嘉慶版《道藏輯要》作為考證《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的研究方法，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換言之，趙宗誠一文推算《道藏輯要》新增七十九種道經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武斷和粗疏的。更為不妥的是，趙宗誠在這種失實結論的基礎上推算出一個並不存在的《道藏輯要》祖本；他錯誤地推論說：彭定求從《道藏》內精選出二百種重要的道經，編成《道藏輯要》，按二十八宿字號，分成二十八集<sup>20</sup>。

從上述的研究回顧，可以總結說，雖然嘉慶版《道藏輯要》是繼明代《道藏》之後清代最重要的道教叢書，但學術界至今對它的認識和研究仍處於一種不理想的狀況：一直依靠和不斷轉引前人的錯誤說法。這種不理想的研究局面不能完全歸咎於翁獨健、趙宗誠或卿希泰等學者研究的誤導。就事實而言，早於光緒三十二年賀龍驤等編纂《重刊道藏輯要》時，編纂者已是有意地對《道藏輯要》的來歷提供一種錯誤的說法，且至今仍然為許多學者、出版商和中國大陸各省及大學圖書館目錄所引用<sup>21</sup>。在《重刊道藏輯要》，賀龍驤撰有三篇序文和後記，包括有：〈校勘道藏輯要書後〉、〈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及〈欽定道藏全書總目序〉，均重複地構造一種《道藏輯要》為康熙彭定求（或彭文勤<sup>22</sup>）所輯的錯誤說法：

聞二仙庵重刊相國彭文勤《道藏輯要》，心輒慕之。<sup>23</sup>

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書總目，止載卷數，

<sup>20</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 27。

<sup>21</sup> 例如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6 年和 1998 年）出版的《道藏輯要》（重刊本）仍然註明該道教叢書的纂輯者為彭文勤。另外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道教文獻》（北京：國家圖書館，2017 年），頁 102-103 記錄存藏於中國大陸各省圖書館的《重刊道藏輯要》，一律註明該道教叢書是由「（清）彭定求輯，（清）閻永和增」。2017 年成都青羊宮出版的《老莊》第 29 期，亦收入王安明〈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梨木經版的故事〉一文，該文仍然標示「彭定求本《道藏輯要》的編撰」（頁 51），另王安明〈道教瑰寶《重刊道藏輯要》經版〉也寫到：「其時有彭定求者。儒道雙修之士，於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編成了《道藏輯要》。」（《巴蜀史志》，2010 年第 5 期，頁 42）。

<sup>22</sup> 「文勤」一名不是彭定求的別字，卻是彭定求之孫彭啟豐（1701-1784）的諡號。

<sup>23</sup> [清]賀龍驤：〈校勘道藏輯要書後〉，閻永和等編：《重刊道藏輯要》（清光緒三十二年 [1906] 至民國六年 [1917] 刊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第 1 冊，書後頁 17b。

未列子目。<sup>24</sup>

相國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出於頒行本者半，出於坊間本者亦半。雖坊本亦皆純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sup>25</sup>

雖然，學者仍須進一步考究為何賀龍驤會認定或是故意造構《道藏輯要》的最初編纂者為彭定求的說法<sup>26</sup>，但是，根據莫尼卡已發表的有關嘉慶《道藏輯要》的版本和流傳，以及《道藏輯要》與蔣予蒲和覺源壇的編纂關係等研究成果，她已經有力地證明實際上不存在彭定求編輯的《道藏輯要》第一個版本（趙宗誠托說：「彭本《道藏輯要》世人罕見。」<sup>27</sup>）反之，可以確證，蔣予蒲是《道藏輯要》第一位編纂者。此外，筆者亦已撰文證明覺源壇在嘉慶年間相繼受呂祖降命編纂《呂祖全書正宗》和《道藏輯要》的淵源關係及發生經過<sup>28</sup>。對於這些研究成果，本文茲不贅述。

對於繼續推動《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的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除了考證編纂者、編纂目的及版本比較等重要問題之外，還有另一個舉足輕重的研究問題尚待解決，即是《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中到底收錄了多少部藏內道經和藏外道經？解決這個研究問題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可以為未來《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一個更可靠和準確的參考依據，特別是研究這些新增道經與主持編纂的相關道教團體的歷史和信仰之關係，以及其中蘊含的不同編纂目的。莫尼卡發表過的兩篇文章——〈《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及“*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曾試圖解答這個問題，然而，其貢獻只限於提出的初步計算數量，未能為研究者提供藏內、藏外道經數目的一個詳細解釋和說明<sup>29</sup>。例如她這樣說：

<sup>24</sup> 賀龍驤：〈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同前註，第2冊，子目初編序卷1，頁20a。

<sup>25</sup> 賀龍驤：〈欽定道藏全書總目序〉，同前註，第8冊，序頁1b。

<sup>26</sup> Daniel Burton-Rose “A Prolific Spirit: Peng Dingqiu’s Posthumous Career on the Spirit Altar, 1720-1906”一文曾對此問題做出簡單的回應，見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7 (2015): 55-56。

<sup>27</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29。

<sup>28</sup> 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年3月），頁101-149。

<sup>29</sup> 莫尼卡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一文的貢獻是提出嘉慶蔣予蒲《道藏輯要》存在不同版本及之間所收入道經的差異，但全文最終沒有討論《道藏輯要》收錄了多少部道經的問題。

在將人文本、巴黎本的〈道藏輯要總目〉所收書目同賀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及丁本〈道藏輯要總目〉所收書目進行比較之後，筆者可以斷言人文本所收道經總數應為二百八十五種，而巴黎本所收道經應為二百八十七種。<sup>30</sup>

蔣本的人文本與巴黎本收錄的藏外道經總數分別為八十四種與八十六種，而賀本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印本與一九八四年以後的印本，其所收藏外道經總數則分別為九十七種與九十八種。<sup>31</sup>

至於《重刊道藏輯要》，一九八四年以前的重印本共收錄三百零三種道經，而一九八四年以後的重印本則共收錄三百零四種道經。在這三百零四種道經中，九十九種（約占三分之一）均失收於《道藏》。<sup>32</sup>

對於莫尼卡提出的有關《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所收藏內和藏外道經數量的說法，本論文將進一步補充、修訂及提出更明確的解釋。

本論文將根據京都人文本、成都嚴雁峰本及巴黎本的三種〈道藏輯要總目〉（並所收道經的實際數目）來跟《重刊道藏輯要》的〈總目〉和〈子目〉進行深入的比較和分析。目的是要為學術界提供一種認識《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到底收錄了多少種藏內和藏外道經的清晰而準確的答案，以俾今後學者能在此基礎上有所足夠的證據可以辨識翁獨健、趙宗誠等學者的錯誤論斷，及其原因和問題所在。筆者相信，只有糾正和擺脫過去的研究錯誤，才可以為《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的研究開創新的有利局面。

## 二、分析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及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的錯誤

由於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一文至今仍然為許多研究者引用，其錯誤的觀點、研究方法和結論一直影響《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的研究發展，因此之故，本論文這部分將詳細分析趙文的問題和錯誤所在之處。如上所

<sup>30</sup>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 10。

<sup>31</sup> 同前註，頁 16。

<sup>32</sup> 同前註，頁 17。

引，趙文提出了蔣予蒲本《道藏輯要》新增道經七十九種和光緒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新增道經（含道書書目）四十種的說法。由於趙宗誠的研究方法是以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為依據，並用它來對照丁福保《道藏精華錄》所收蔣予蒲本的〈道藏輯要總目〉，因此，本部分首先討論〈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的錯誤之處<sup>33</sup>。

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所依據的《道藏輯要》版本不是嘉慶蔣予蒲本，而是光緒《重刊道藏輯要》。翁氏稱：「《道藏輯要》，清賀龍驤初編，彭瀚然參訂，光緒丙午年（1906）成都二仙庵重刊。」<sup>34</sup> 在比較《重刊道藏輯要》與明代《道藏》之後，翁氏得出以下結論：「（《重刊道藏輯要》）計收道經二百八十七種，其中一百十四種是新增的。」<sup>35</sup> 除去《重刊道藏輯要》新增的二十三種道經書目之外，翁獨健提出《道藏輯要》（其實應該說是《重刊道藏輯要》）收入了九十一種新增道經<sup>36</sup>。若把這九十一種新增道經分類區分出來，我們發現：

1. 有七十三種新增道經屬於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總目錄裏的藏外道經類。
2. 有六種新增道經是賀龍驤在編纂《重刊道藏輯要》時，從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收錄的道經中分拆出的獨立道經，包括有《太上感應篇集註》(JY082)，《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JY113)，《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JY204)，《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JY257)，《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JY258)及《文帝陰騭文註》(JY259)。（《道藏輯要》收錄道書編號以JY排序，是沿用《道藏輯要》研究計畫項目的做法）
3. 另有九種新增道經是賀龍驤在編纂《重刊道藏輯要》時新補但嘉慶《道藏輯要》未收的藏外道經，包括有《觀音大士蓮船經》(JY102)、《呂祖東園語錄》(JY172)、《五篇靈文》(JY193)、《張三丰先生全集》(JY236)、《三寶萬靈法懺》(JY247)、《文昌帝君本傳》(JY254)、《太上玄門功課經》(JY263)、《四川青羊宮碑記》(JY294)及《青城山記》(JY308)。

<sup>33</sup> 莫尼卡稱：「迄今為止，對藏外道經（即明本《道藏》失收道經）書目的計算都以翁獨健的〈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為準。不過翁獨健的目錄還需要修正。」見《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15。

<sup>34</sup> 翁獨健編：《道藏子目引得》，頁iii。

<sup>35</sup> 同前註。

<sup>36</sup> 同前註，頁38-40。

4. 翁獨健將兩種原附於《元始天王大洞玉經·文帝本》(JY006)和《呂祖東園語錄》(JY172)的道經分拆為獨立道經，分別為《洞經示讀》(JY007)和《東園雜詠》(JY172)，均屬於藏外道經。
5. 最後，翁獨健把《道藏》已收入的《至真歌》(JY173)錯誤地歸入新增的藏外道經。

據以上五種「《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的類別，我們已經可以證明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提出的有關《重刊道藏輯要》收入九十一種新增道經的數目是不準確和不完整的。例如第四項所指出的《洞經示讀》和《東園雜詠》，只是翁獨健自己拆開出來的新增道經，但是這兩種道經在《重刊道藏輯要》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

翁獨建〈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的另一大問題，是該〈目錄〉無法準確地區分嘉慶蔣予蒲本《道藏輯要》和光緒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各自新增的道經種類和數目。實際上，比對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總目〉和〈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後者缺收了八種嘉慶本《道藏輯要》收入的新增藏外道經，包括有：

1. 《元始天王大洞玉經·文帝本》(JY006)。
2. 《太上黃庭外景經·蔣國祚注》(JY076)。
3.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文昌、孚佑帝君合注》(JY087)。
4. 《文始真經言外旨》(JY134)。
5. 《紫陽帝君悟真篇三註》(JY175)。
6. 《悟真篇拾遺》(JY176)。
7. 《金液還丹印證圖詩》(JY208)。
8. 《皇極經世·附擊壤集》(JY252)。

其次，對照光緒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又缺收四種重刊本新增的藏外道經，包括《孚佑上帝本傳》(JY160)、《朝天謝罪懺》(JY248)、《文帝化書》(JY255)和《關帝本傳》(JY261)。因此，總結而言，〈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提出《重刊道藏輯要》收入九十一種新增道經的說法肯定是錯誤、不準確及沒有利用價值的。

以下討論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一文的問題。對於嘉慶蔣予蒲本《道藏輯要》和光緒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新增道經數量的比較分析，趙宗誠的結論是：

1. 蔣予蒲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共七十九種。
2. 成都二仙庵閻永和等據嚴雁峰藏蔣本《道藏輯要》重刻時，又增補重要道書十七種於內。<sup>37</sup>

首先，趙氏的研究方法是將翁獨建〈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與丁福保《道藏精華錄》所收蔣予蒲本〈道藏輯要總目〉（版本不詳）來做比對，目的在找出《道藏輯要》與《重刊道藏輯要》各自新增的道經。但是，由於趙文是建立在翁獨健〈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的錯誤基礎之上，因此趙氏稱「蔣予蒲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共七十九種」的說法，同樣是錯誤的。例如，趙氏未能認識到〈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缺收了的七種為蔣予蒲《道藏輯要》收入的新增藏外道經<sup>38</sup>。其次，趙氏抄錄出來的七十九種新出道書目錄亦未有包括〈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已錄出的《太上道德大天尊說道元一氣經》(JY056)。

第三，在趙氏所列出的蔣予蒲增補七十九種《道藏》外的新收道經中，有三種其實屬於藏內道經，即蔣本《道藏輯要》從明代《道藏》中選錄出來的道經，包括有《至真歌》、《西川青羊宮碑銘》及《華蓋山浮邱、王、郭三真君事實》，因此，這三種藏內道經不能如趙所說的，屬於「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因此，應該要從七十九種中減除這三種。第四，趙氏把屬於藏內道經的《五篇靈文》列為蔣予蒲增補的七十九種道經之一，這亦是誤判的。《五篇靈文》實際是在一九〇六年時才由《重刊道藏輯要》的編纂者增補的，因此不應計入蔣本《道藏輯要》新增道經數目之內。據此考量，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一文提出「蔣予蒲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共七十九種」的說法既是錯誤，又不準確。

最後，關於趙氏所列出的七十九種為蔣本《道藏輯要》增收的道經種類，除

<sup>37</sup> 節錄自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 30。

<sup>38</sup> 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總目〉收有《元始天王大洞玉經·文帝本·附洞經示讀》。〈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只列《洞經示讀》三卷，而沒有《元始天王大洞玉經·文帝本》。而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則據嚴本《道藏輯要》列為「元始天王大洞玉經 3 卷，文昌帝君傳本，附洞經示讀」，因此，本論文說〈道藏輯要新增道經目錄〉缺收 8 種（見本文頁 12），而趙文則缺收 7 種。見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 27。

了上述指出的《至真歌》、《西川青羊宮碑銘》及《華蓋山浮邱、王、郭三真君事實》和《五篇靈文》等四種藏內道經之外，其餘七十五種理應可以歸入新增藏外道經類之中。但更複雜的事情是，其中有三種並未收入京都人文本或是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的〈總目〉裏，包括有《太上感應篇集註》(JY082)、《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彭好古解》(JY113)和《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JY204)。事實而言，這三種藏外道經卻是《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從蔣本《道藏輯要》所收入的三種藏外道經（即是《太上感應篇》、《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和《孫不二元君法語》）中分拆出來的新增道經。以嘉慶蔣本的〈道藏輯要總目〉為基準來計算，在趙文所列出的七十九種藏外道經的名單中，其實只有七十二種屬於蔣本《道藏輯要》增補的藏外道經，而不是七十九種，因為要減去《至真歌》、《西川青羊宮碑銘》及《華蓋山浮邱、王、郭三真君事實》、《太上感應篇集註》、《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彭好古解》、《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五篇靈文》等七種道經。對比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總目〉實收的八十三種藏外道經，修訂後趙氏所列出的七十二種蔣本新增道經實在還缺少十一種之多（案：不包括蔣本把一些附經，和由合併經文分列出的多種獨立道經，詳見下文解釋），包括有：

1. 《太上道元一炁經》(JY056)。
2. 《太上黃庭外景經·蔣國祚注》(JY076)。
3.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文昌、孚佑帝君合注》(JY087)。
4. 《文始真經言外旨》(JY134)。
5. 《鍾呂傳道集》(JY149)。
6. 《紫陽帝君青華秘文》(JY174)。
7. 《紫陽帝君悟真篇三註》(JY175)。
8. 《悟真篇拾遺》(JY176)。
9. 《金液還丹印證圖詩》(JY208)。
10. 《皇極經世·照精義本恭錄·附擊壤集》(JY252)。
11. 《華蓋山三仙真經》(JY297)。

除了提出蔣本《道藏輯要》新增道經之數為七十九種的說法是錯誤和不準確之外，同樣，趙文提出「成都二仙庵閻永和等據嚴雁峰藏蔣本《道藏輯要》重刻時，又增補重要道書十七種於內」的說法亦是有誤的。可惜，這種錯誤的說法卻一直為學者

所接納和引用<sup>39</sup>。據趙文所列出的十七種為光緒《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增補的道經，包括有：

1. 《太上道元一炁經》(JY056)。
2. 《觀音大士蓮船經》(JY102)。
3. 《孫真人千金方》(JY147)。
4. 《呂祖東園語錄》(JY172)。
5. 《東園雜詠》。
6. 《張三丰先生全集》(JY236)。
7. 《三寶萬靈法懺》(JY247)。
8. 《太上靈寶朝天謝罪法懺》(JY248)。
9. 《擊壤集》(JY253)。
10. 《關聖帝君本傳》(JY261)。
11. 《文昌帝君本傳》(JY254)。
12. 《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JY257)。
13. 《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JY258)。
14. 《文帝陰鷲文註》(JY259)。
15. 《太上玄門功課經》(JY263)。
16. 《漢天師世家》(JY299)。
17. 《青城山記》(JY308)。

據知，賀龍驤等《重刊道藏輯要》的編纂者主要是以嚴雁峰所藏蔣本《道藏輯要》為其編纂《重刊道藏輯要》的底本。然而，筆者在查照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時，卻發現趙文所稱《重刊道藏輯要》增補十七種道經之說法亦是錯誤的。首先，在十七種增補道經名單中，《太上道元一炁經》、《擊壤集》和《漢天師世家》等三種道經都已經收進嚴本《道藏輯要》裏，因此不能被算作《重刊道藏輯要》的新增道經。其次，雖然《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和《文帝陰鷲文註》這三種道經都不見於嚴本的〈道藏輯要總目〉，但

<sup>39</sup> 例如李合春、丁常春編著：《青羊宮二仙庵誌》（成都：四川省新聞出版社，2006年），頁20；郭旭陽：〈閻永和重刊《張三丰全集》考述〉，《鄖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31卷第1期（2011年2月），頁13；王安明：〈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梨木經版的故事〉，《老莊》第29期（2017年），頁53。

是，它們仍然被收入嚴本《道藏輯要》的「星集七」之內，因此，不能如趙文所說的，歸入《重刊道藏輯要》新增道經<sup>40</sup>。第三，《重刊道藏輯要》增補了《呂祖東園語錄》並附有《東園雜詠》，據此，《重刊道藏輯要》是把《東園雜詠》列為附經，因此，不應把它計入為一種獨立的道書。

總結以上的考證，趙文所列的十七種《重刊道藏輯要》增補道經，其實只有十種可被真正計入光緒《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新增的數目。然而，這十種道經又不是《重刊道藏輯要》增收道經的最後數目。在比較嚴本〈道藏輯要總目〉和〈重刊道藏輯要總目〉之後，筆者又發現《重刊道藏輯要》增補道經之數量不止十種之數，趙文還欠錄了《孚佑上帝本傳》(JY160)、《文帝化書》(JY255)、《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JY264)、《青羊宮二仙菴碑記》(JY293)等四種道經。總括來說，光緒三十二年，閻永和、賀龍驥等以嚴本《道藏輯要》作為底本的基礎上編纂了《重刊道藏輯要》，但增補了十四種道經（藏內道經三種，藏外道經十一種），以及二十三種道經書目。（案：民國六年版《重刊道藏輯要》再增補多三種道經，見本論文第四部分。）

### 三、蔣予蒲《道藏輯要》所收道經的數量、類別和編纂目的

莫尼卡曾慨嘆說：「《道藏輯要》的形成至今仍是個謎。」<sup>41</sup> 學術界不僅不清楚編纂者是誰，而且也不明晰嘉慶年間刊刻的《道藏輯要》總共流傳了幾種不同的版本，以及到底《道藏輯要》收錄了多少部道經。造成未能解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因為過去許多研究者缺乏運用（或未能找到）蔣本《道藏輯要》作為準確的文獻依據，以及未能深入比較不同《道藏輯要》版本間的差異，以致學者經常引用一些對《道藏輯要》收錄道書做出錯誤計算的數據和研究結論。甚至有學者提出「《道藏輯要》屬於『全真派』的道藏」<sup>42</sup>的錯誤論斷。

<sup>40</sup> 參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 144; 垣內智之、池平紀子合著：〈道藏輯要版本考〉，頁 284。

<sup>41</sup>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 2；Monica Esposito, "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 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p. 44.

<sup>42</sup> 見 Vincent Goossaert, "The Quanzhen Elergy, 1700-1950," in John Lagerwey, ed., *Religion and Chinese*

本論文第三部分將依據五種不同的《道藏輯要》版本，來解答到底《道藏輯要》共收錄了多少部道經的問題。它們包括有京都人文本、成都嚴雁峰本、巴黎本、大阪中之島本及北京白雲觀本。然而，解答這個複雜的問題之先，筆者要指出的是，我們或許要接受不存在一個單一、絕對的答案。因為，採取不同計算的方法必會造成不同的答案。這種版本上的複雜情況，特別造成了研究《道藏輯要》的困難和障礙。

首先，要指出文獻方面的客觀事實是：不同的嘉慶版《道藏輯要》收錄不同數量的道經。例如《心傳述證錄》(JY245)，京都人文本、成都嚴雁峰本、巴黎本和北京白雲觀本都收入在「鬼集七」內，但是大阪中之島本、東洋文庫本和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本均沒有收錄該經<sup>43</sup>。另一個已經提及的例子是《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巴黎本和北京白雲觀本都把這兩部與湖州金蓋山道壇有關的呂祖道經收入「箕集十」及「箕集十一」，但是京都人文本、成都嚴雁峰本及大阪中之島本等的箕集只錄有集一至集九，因此並沒有收入「箕集十」的《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箕集十一」的《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

其次，各種嘉慶版《道藏輯要》的〈總目〉所記載的經目與其實收的道經數目是不一致的。上文已屢屢提及了這種編目混亂的情況，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不同版本的《道藏輯要》在刊刻過程中出現各種修訂上的改變。因此之故，這種與實收道經不一致的情況亦是造成翁獨健和趙宗誠在研究《道藏輯要》收錄多少部道經的問題上做出錯誤判斷的主要成因。例如《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JY204)就未被京都人文本或成都嚴雁峰本的〈道藏輯要總目〉列出，但是該經卻實收入嚴本《道藏輯要》的「胃集七」裏。又例如嚴本〈道藏輯要總目〉的星集沒有提及《文帝寶經》和《武帝寶經》，但是在嚴本「星集九」的經文裏，卻發現六種與文昌帝君和關聖帝君有關的道經，包括有：《文帝孝經》(JY256)、《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JY257)、《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JY258)、《文帝陰騭文註》

---

*Society*, vol. 1 (Hong Kong and Pari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nd EFEO, 2004), p. 745; and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 275。

<sup>43</sup>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p.140-142; 垣內智之、池平紀子合著：〈道藏輯要版本考〉，頁 279。

(JY259)、《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JY260)和《關聖帝君本傳》(JY261)。其實，《文帝寶經》和《武帝寶經》這個例子還具有更複雜的情況，即是：雖然京都人文本、北京白雲觀本和巴黎本等〈道藏輯要總目〉的「星集七」與成都嚴雁峰本「星集七」所列出的經目不同，前三種版本均載有《文帝寶經》和《武帝寶經》這兩種經題，但實際上，收錄在這幾些《道藏輯要》版本的「星集七」裏的《文帝寶經》和《武帝寶經》，卻與成都嚴雁峰本「星集九」所實收的六種文昌帝君和關聖帝君的道經完全相同。

第三，造成學者對《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數量問題不容易達成一致的原因，是因為各自可以採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和標準。其中，使計算方法出現差異的因素，係於《道藏輯要》實際收錄道經的數量與〈總目〉所載的經目經常不同。一部道經由幾種獨立經文併合而成的情況很多。例如京都人文本、北京白雲觀本和巴黎本，原來〈總目〉「尾集四」的經題記有《太上感應篇》，但實際上「尾集四」的經文卻有兩種道經：《太上感應篇箋註》(JY081)和《太上感應篇集註》(JY082)。另一個例子是「斗集一」的《五斗經》，京都人文本《五斗經》卻包括有東、南、西、北、中共五種的斗經：《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JY103)、《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JY104)、《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JY105)、《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JY106)及《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JY107)。因此，解決計算差異的出路就在於學者是否同意筆者以下建議的做法：倘若一種道經經題包含多過一種道經，我們就按實收道經的數目把它們分別計算，並計為多種的獨立道經。本論文嘗試採用這種計算方法，以下會詳細說明我們計算的結果。

在〈《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一文中，莫尼卡曾提出她對《道藏輯要》收錄多少部道經的答案：「筆者可以斷言人文本所收道經總數為二百八十五種，而巴黎本所收道經總數應為二百八十七種。」<sup>44</sup> 京都人文本和巴黎本這兩個版本的數目差異只在於後者多收有《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莫尼卡這個計算數量當然不止於〈總目〉所載的經目數量，她還把一些「附經」或原來屬於「合併」的道經都分拆成為多種獨立的道經，以及將〈總目〉未列出的但卻實收在《道藏輯要》裏的道經都計入總數。例如以京都人文本為例，

<sup>44</sup>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 10。

莫尼卡計出道經總數為二百八十五種。她的計算方法如下<sup>45</sup>：

1. 京都人文本〈總目〉的經目數量是二百六十八種（而巴黎本則為 270 種）。
2. 莫尼卡把十七種附經分別列為獨立的道經，包括：(1) 附於《元始天王大洞玉經·文帝本》(JY006) 的《洞經示讀》(JY007)。(2) 附於《抱朴子內篇》(JY144) 的《抱朴子外篇》(JY145)。(3) 附於《皇極經世》(JY252) 的《擊壤集》(JY253)。(4) 附於《太上道德真經集註》(JY049) 的《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釋文》(JY050) 和《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雜說》(JY051)。(5) 附於《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真經·八洞仙祖合註》(JY054) 的《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李道純註》(JY055)。(6) 附於《太上感應篇箋註》(JY081) 的《太上感應篇集註》(JY082)。(7) 《五斗經》的《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8) 附於《金碧古文龍虎上經》(JY112) 的《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彭好古解》(JY113)。(9) 附於《王重陽祖師立教十五論》(JY190) 的《丹陽真人直言》(JY191)。(10) 《文帝寶經》包含的《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JY257)、《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JY258) 和《文帝陰騭文註》(JY259) 等十七種道經。
3. 雖然《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JY204) 沒有錄入京都人文本〈總目〉，但是實收入「胃集七」裏，因此，應可計為另外一種獨立的道經。
4. 雖然〈總目〉「壁集四」收入《孚佑上帝三寶心鏡》，但是莫尼卡認為該經應歸併為《孚佑上帝語錄大觀》的一部分，不算為獨立道經。（案：筆者認為應把《孚佑上帝三寶心鏡》計為另外一種獨立的道經。）

結合以上四種計算方法（即是 1+2+3-4），莫尼卡的推算結果是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的實收道經總數就成了二百八十五種，而巴黎本則為二百八十七種。

對於《道藏輯要》實收「藏外道經」之數，莫尼卡在《〈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一文未有詳細的解釋，只提出她的計算結果，即說：「蔣本的人文本與巴黎本收錄的藏外道經總數分別為八十四種與八十六種。」<sup>46</sup> 對於莫尼卡這個說法及其依賴的理據，許多學者了解不深，兼且筆者認為還有需要修訂的餘地，因此，以下

<sup>45</sup> 同前註。

<sup>46</sup> 同前註，頁 16。

筆者嘗試以京都人文本、成都嚴雁峰本、巴黎本作為主要的版本依據，進一步提出新的補充看法，以解決《道藏輯要》究竟收錄多少部「藏內」和「藏外」道經的問題。

首先，若只計算〈道藏輯要總目〉所錄經題的數量，筆者認為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的道經總數應為二百六十九種。這個數目與莫尼卡所持二百六十八種的說法稍有不同。原因是，筆者認為既然〈道藏輯要總目〉（案：巴黎本和成都嚴雁峰本均與京都人文本相同）清楚地把《孚佑上帝三寶心鏡》歸入「壁集四」，並且從「壁集三」《孚佑上帝語錄大觀》中分錄出來，因此，筆者贊成把《孚佑上帝三寶心鏡》列為獨立的道經，而沒必要如莫尼卡的做法把它當作為《孚佑上帝語錄大觀》的一部分。然而，由於〈道藏輯要總目〉的經題數量與《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數目存在差別，因此，筆者同意莫尼卡的提議，把《道藏輯要》的附經和合併的經文分別列為十七部獨立的道經。這種處理方法是合理和適當的。因此，把十七部獨立的道經和〈道藏輯要總目〉所載的二百六十九種道經一起合計之後，我們可以確定說：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總數為二百八十六部。至於巴黎本《道藏輯要》，因為〈總目〉的經題數量與《道藏輯要》實收的道經數目都與京都人文本幾乎相同，差別只在於多收了《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因此，巴黎本〈道藏輯要總目〉的經題數量為二百七十一種，而實收道經的總數目為二百八十八部。

至於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即是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所依據的底本），它的刊刻時間比京都人文本和巴黎本較早，並且內容也有差異。首先，據筆者的點算，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總目〉收錄的經題數量為二百六十八種。其次，成都嚴雁峰本「星集七」將《邵康節先生擊壤集》(JY253)列為一種獨立道經，並從《皇極經世》(JY252)分列出來，但京都人文本和巴黎本的「星集八」卻將《邵康節先生擊壤集》作為附經併入《皇極經世》。第三，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總目〉星集未有提及《文帝寶經》和《武帝寶經》（案：雖然〈道藏輯要總目〉無，但經文內容卻有收入），但是，京都人文本和巴黎本的〈總目〉「星集七」均顯示有該二經的經題。最後，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總目〉的經題數量為二百六十八種，比起京都人文本（269種）和巴黎本（271種）少收一種及三種。儘管有上述三點的不同，但是從整體實收道經的數目而言，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又與京都人文本沒有差異，均為二百八十六部，同樣是比巴黎本少收了《玉清贊化九天演

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

總結來說，若以「初刻本」和「增補本」來區分嘉慶蔣予蒲編纂《道藏輯要》的不同版本，則可確定說，初刻本《道藏輯要》（以成都嚴雁峰本和京都人文本為代表<sup>47</sup>）實收道經的總數目為二百八十六部，而增補本為二百八十八部（以巴黎本、北京白雲觀本和柏克萊大學本為代表）。

接著下來，筆者要討論的重要問題是蔣予蒲《道藏輯要》收錄多少部藏外道經。這個問題直接關係著我們進一步探索蔣予蒲編纂《道藏輯要》時究竟增補了什麼道經，這批道經的來歷，以及整部由覺源壇弟子出於呂祖降命而編成的《道藏輯要》，其目的和意義所在。

通過考證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之〈總目〉的經題數量及經內實收道經的數目，並加上比對明代《正統道藏》，筆者計算出在京都人文本〈總目〉收錄的二百六十九種道經中，有一百八十六種藏內道經及八十三種藏外道經。而在成都嚴雁峰本〈總目〉的二百六十八種經目中，有一百八十六種藏內道經及八十二種藏外道經。至於巴黎本、北京白雲觀本等增補本的〈道藏輯要總目〉，則收有一百八十六種藏內道經及八十五種藏外道經。

如上所述，各種嘉慶版《道藏輯要》之〈總目〉所記載的經目之數與其實收道經數目不一致。因此，要進一步計算《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總數，筆者認為，首先需要處理好附經數目和由原來合併經文而分拆出來的獨立道經的問題。例如，從明代《道藏》收入的各種附經應可以歸入藏內道經之數，即有：《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釋文》(JY050)、《太上道德真經集註雜說》(JY051)、《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李道純註》(JY055)、《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抱朴子外篇》(JY145)和《丹陽真人直言》(JY191)等十種（案：實數應該為九種，因為〈道藏輯要總目〉已計入《五斗經》一種之數，因此分拆後的《五斗經》只增加四種）。

<sup>47</sup> 本論文要補充一點：事實上還有比成都嚴雁峰本和京都人文本更早的《道藏輯要》版本，例如有大阪中之島本和東洋文庫本。後兩種版本沒有收錄《心傳述證錄》、《文帝孝經》、《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及《文帝陰鸞文註》等6部道經。參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p. 139-145; 垣內智之、池平紀子合著：《道藏輯要版本考》，頁279。

其次，至於原屬附經和由合併經文而分拆出來的藏外道經的數量則有八種，包括：《洞經示讀》(JY007)、《擊壤集》(JY253)、《太上感應篇集註》(JY082)、《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彭好古解》(JY113)、《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JY204)、《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JY257)、《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JY258)、《文帝陰騭文註》(JY259)。

第三，若是把上述分拆出來的九種藏內道經和八種藏外道經加進〈道藏輯要總目〉所列道經的總數中，新的合計結果是：京都人文本實收一百九十五種藏內道經（從原來 186 種之數增添 9 種），而藏外道經總數為九十一種（由原來 83 種之數增添 8 種）。據此推算，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總數為二百八十六種。至於成都嚴雁峰本，雖然其〈總目〉錄入的道經經目數量比京都人文本（269 種）少了一種（雖然增加了《擊壤集》，但沒有《文帝寶經》和《武帝寶經》），但是，實際收入道經之數量則與京都人文本相同，即總數共為二百八十六種，包括一百九十五種藏內道經和九十一種藏外道經。最後，以巴黎本和北京白雲觀本為代表的增補本，因為增添了《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這兩部道經，因此，其實收道經之數為二百八十八種，即實收一百九十五種藏內道經和九十三種藏外道經。

以下，筆者轉入討論藏外道經（京都人文本 91 種）與蔣予蒲和覺源壇的關係。首先，莫尼卡·森由利亞和筆者均已分別指出了《道藏輯要》與覺源壇弟子有密切的淵源關係<sup>48</sup>。其次，嘉慶十年（1805）蔣予蒲同覺源壇弟子編成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sup>49</sup>。嘉慶十年之後，覺源壇弟子又再進一步展開經歷十年時間編纂《道藏輯要》的工作。《道藏輯要》收載有兩篇由大羅領班蘇朗真人和鍾離權祖師降鸞的序文，二者同樣提及覺源壇弟子虔奉孚佑帝君呂祖之命編纂《道藏輯要》之事。

<sup>48</sup> 參モニカ・エスポジト（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頁 250-251；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 18；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第 98 號（2001 年），頁 33-52；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頁 105-111。

<sup>49</sup> 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現藏有嘉慶十年《呂祖全書正宗》刊本（以下稱大谷本《全書正宗》），四函，共二十冊。《全書正宗》卷 1 收載有一篇由弟子覺源壇志超（俗名吳璣，?-1822）題識的〈十六品經後跋〉，稱：「時嘉慶乙丑（十年）[1805]上元節志超弟子吳璣百拜敬識。」見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卷 1，頁 109b-110a。

蘇朗真人序稱：「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付諸剞劂……。」<sup>50</sup> 鍾離權〈道藏輯要序〉稱：「純陽子憫後之學者，將莫識厥趨也。命覺源諸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sup>51</sup>

蔣予蒲編纂《道藏輯要》時，直接從《呂祖全書正宗》選出十六種道經，只有《金剛經註》和《禪宗正旨》這兩種與釋教有關的經書沒有被收進，它們包括：

1. 《孚佑上帝十六品經》(JY159)。
2. 《孚佑上帝天仙金華宗旨》(JY161)。
3. 《孚佑上帝同參經》(JY162)。
4. 《孚佑上帝五經合編》(JY163)。
5. 《孚佑上帝文集》(JY164)。
6. 《孚佑上帝詩集》(JY165)。
7. 《太上道德經解·八洞仙祖合注》(JY045)。
8. 《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JY100)。
9. 《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JY131)。
10. 《孚佑上帝易說》(JY167)。
11. 《(鍾呂)傳道集》(JY149)。
12. 《孚佑上帝天仙金丹心法》(JY171)。
13. 《玄宗正旨》(JY110)。
14. 《孚佑上帝示定十戒功過格》(JY278)。
15. 《孚佑上帝聖蹟紀要》(JY170)。
16. 《孚佑上帝語錄大觀》(JY168)。

在這批呂祖道經中，《太上道德經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玉樞寶經》、《玄宗正旨》和《孚佑上帝示定十戒功過格》等五部道經都被稱作是由孚佑上帝呂祖直接通過扶乩降示於覺源壇弟子。例如《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就係一部有關修心煉性的道經。據該經所說，斗姥元君和孚佑上帝純陽呂祖於九皇寶誕的慶祝期間在覺源壇上降示了這部經典。該經起首〈讚偈〉稱：「本壇恭逢斗帝聖誕，舉行慶祝典禮，幸蒙慈照，普被恩光，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九

<sup>50</sup>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卷1，蘇序頁6a-b。

<sup>51</sup> 鍾離權（託）：〈道藏輯要序〉，同前註，鍾序頁5a。

品。」<sup>52</sup>

除此，還有孚佑上帝呂祖在覺源壇、涵三宮（武昌）、白龍精舍（常州）等道教乩壇降示的多部道經，《道藏輯要》編纂者把它們都收入在《道藏輯要》二十八集道經中的第十三集（室集一至七）到第十四集（壁集一至六）裏。正如莫尼卡所言：「第十三集（室集一至七）到第十四集（壁集一至六）是《道藏輯要》的核心內容，包括孚佑上帝呂洞賓所作或與之相關、扶乩降筆而作的道經。」<sup>53</sup>

其次，在《道藏輯要》所收載的九十一種藏外道經中，有多部道經附有由覺源壇掌壇真人——宏教真君柳守元、蔣予蒲或其他覺源壇弟子所撰的序文、題詞或跋文。據清初呂祖乩壇信仰的研究，柳守元真君是孚佑帝君的首座弟子<sup>54</sup>。不僅被奉為掌壇真君，覺源壇弟子志秋撰《孚佑上帝天仙金華宗旨》（JY161）的〈後跋〉更稱柳守元真君為該壇天仙派的第二祖：「孚佑帝師，天仙之始祖也，宏教恩師，天仙之二祖也。」<sup>55</sup>在《道藏輯要》所收載的九十一種藏外道經中，附有柳守元真君降乩而撰成的序文和題詞的道經合計有：《太上道德經解·八洞仙祖合注》（JY045）、《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卷上·文昌、孚佑帝君合注》（JY087）、《玄宗正旨》（JY110）、《十六品經》（JY159）、《孚佑上帝天仙金華宗旨》（JY161）、《同參經》（JY162）、《五經合編》（JY163）、《孚佑上帝文集》（JY164）、《孚佑上帝詩集》（JY165）、《易說》（JY167）、《聖蹟紀要》（JY170）、《天仙金丹心法》（JY171）、《懺法大觀》（JY246）及《清微宏範道門功課》（JY262）等。例如在〈玉皇本行集經跋〉，柳守元稱：「乙丑（嘉慶十年，1805）夏南水盛漲，本壇諸子矢願廣布此經，以濟劫運於未然，故為

<sup>52</sup> 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收入同前註，斗集一，頁 2a。另外，關於此經的研究和白話註釋，參黎志添編譯：《修心煉性——〈呂祖疏解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白話註譯》甲、乙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年）。

<sup>53</sup> 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 20。

<sup>54</sup> 見柳守元（託）：〈三品經原記〉，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 1，頁 105a；柳榮（託）：〈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清〕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道光三十年 [1850] 刊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卷 15，頁 20a。參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頁 127-130。

<sup>55</sup> 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壁集二，後跋頁 4b；另見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 2，頁 68a。

敬識數語於後。宏教司柳守元謹跋。」<sup>56</sup> 柳守元不僅是許多《道藏輯要》所收入道經的序文和跋文的托名撰者，而且更被說成是在覺源壇降乩、闡演新道經的作者，例如《清微宏範道門功課》(JY262)和《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JY285)分別註明是由「宏教真人柳守元撰」及「開玄闡秘宏教真君柳守元撰」<sup>57</sup>。

第三，《道藏輯要》收載多篇由覺源壇諸位弟子如惠覺（即蔣予蒲，又名夢因）、恩洪、志秋（范鏊）、志喜（徐震）、大器、大固（金光悌）、志懋（戴均元）、志通（程國仁）、梅芳（即蔣曰綸，蔣予蒲之父）、通仁（賞錯）等撰寫的序、跋文（見表二）。這是清楚有力的證據，證明《道藏輯要》這部清代唯一的道藏叢書實是出於覺源壇弟子的編纂成果，並且包含著他們虔奉孚佑帝君呂祖的天仙派信仰。據此證據，筆者認為所謂「《道藏輯要》的形成至今仍是個謎」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實在不需要再爭論。我們可以總結：嘉慶年間覺源壇弟子蔣予蒲就是原本《道藏輯要》的總編纂者。

最後，對於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的動機和目的的問題，筆者十分贊成莫尼卡的說法，即是我們必須要在覺源壇的天仙派信仰處境中去認識所謂「輯要」的真正意思<sup>58</sup>。對於「道藏輯要」的理解，趙宗誠和卿希泰均做出錯誤的解讀，他們認為「輯要」即是「節本」、「精選」的意思：

彭定求……在明本《道藏》中，精選出道書二百種，編成叢書，按二十八宿字號，分為二十八集。舉凡道教重要經典、歷代祖師、真人著作、修煉丹訣、科儀規戒、仙傳譜記，悉有收錄，實為《道藏》之節本。因為是從《道藏》選出重要道書編纂而成的道經叢書，故總名之為《道藏輯要》。<sup>59</sup>

筆者不同意這種錯誤理解「輯要」意思的觀點。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的神學目的很清楚，且在祖師降鸞的《道藏輯要·序文》和《道藏輯要·凡例》有清

<sup>56</sup> 柳守元（託）：〈玉皇本行集經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箕集三，頁40b。

<sup>57</sup> 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張集一，頁1a、張集七，頁1a。另參森由利亞：〈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と全真教——『清微宏範道門功課』の成立をめぐる〉，堀池信夫、砂山稔編：《道教研究の最先端：第一九回国際宗教学宗教史會議世界大会道教パネル論集》（東京：大河書房，2006年），頁82-108。

<sup>58</sup> 參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22-23；Monica Esposito, “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 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pp. 65-70.

<sup>59</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27；卿希泰：〈《重刊道藏輯要》縮印本序〉，頁1。

楚的表述和解釋。蘇朗真人的〈道藏輯要序〉稱孚佑帝君降乩命敕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的準則，是要「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真之典要」<sup>60</sup>。《道藏輯要》的編纂目的乃是要輯成一部以丹道修煉為要旨的屬於天仙派大乘的經典；所以蘇朗真人說：這部新的「道藏」是要成就「性命之全功，天仙之大乘」<sup>61</sup>。至於那些僅屬於小乘的道術經書，同「真正覺悟」相去甚遠，正如鍾離權〈道藏輯要序〉所稱的：「古今道術殊途，如服食、導引、吐納、採取、燒煉、漱咽、符咒諸家，獨闢旁門，自落小乘，漸遠於自然，終離乎正覺。」<sup>62</sup>新的《道藏》要捨棄這些小乘經典，而只編入符合「道旨丹功」大乘宗旨的丹道經書。借用莫尼卡的說語：「此『丹道之真傳』的綜合構成了《道藏輯要》的核心。」<sup>63</sup>

同樣，《道藏輯要》的十二條〈凡例〉亦清楚訂立了收錄道經的標準。例如〈凡例〉（四）表明《道藏輯要》收錄的是那些具備「道旨丹功」的道經，並且不能是龐雜的，因為「輯要」的要旨是要達致「同條共貫，的的正宗」的目標<sup>64</sup>。因此，不附合「道旨丹功」、「丹道之真傳」等目標的道書，《道藏輯要》概不收錄。〈凡例〉（十）列明：「茲編所載，非於道旨丹實有發明者，概不列入。」<sup>65</sup>〈凡例〉（五）和（九）具體提出以下三類道書一概不收：1. 旁門左道、非正道的丹經。2. 「太涉繁雜」的道書和科儀類書（例如 268 卷的《道法會元》、100 卷的《無上秘要》、100 餘卷的《太平經》和 220 卷《靈寶領教濟度全書》等）。3. 一切符籙專本<sup>66</sup>。

覺源壇是由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進士、並獲翰林院庶吉士頭銜的蔣予蒲及其同門弟子共同在北京創立的道教呂祖乩壇。該呂祖乩壇以「覺源」為名，含有「滴滴歸源，乃為正覺」的意思<sup>67</sup>。「滴滴歸源」是從覺源壇的正統性來說，該壇是千百餘載以來，呂祖降鸞的正宗之壇。所以呂祖的鸞序稱：「（覺源壇）是為千百餘載，千百餘壇，歷來所傳之真印，今乃可名以『正宗』。」<sup>68</sup>覺源壇弟子經常自稱為

<sup>60</sup>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卷 1，蘇序頁 6a-b。

<sup>61</sup> 同前註，蘇序頁 7a-b。

<sup>62</sup> 鍾離權（託）：〈道藏輯要序〉，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卷 1，鍾序頁 4a-b。

<sup>63</sup> 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 22。

<sup>64</sup> 見〈道藏輯要凡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卷 1，凡例頁 1b。

<sup>65</sup> 同前註，凡例頁 3a。

<sup>66</sup> 同前註，凡例頁 1b-3a。

<sup>67</sup> 蔣予蒲：〈全書正宗自序〉，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 35a。

<sup>68</sup> 同前註，序頁 34a-b。

「天仙嗣派弟子」，例如蔣予蒲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自署為「天仙嗣派者廣化弟子惠覺謹誌」<sup>69</sup>。覺源壇的道教信仰核心建立在金丹修煉的基礎上，且相信修煉金丹之法是由呂祖開示弟子往昇天仙的覺路。所謂「金丹之道」，即是指修煉性命的內丹道。例如由先天斗帝（斗姆元君）敕演及純陽呂祖天師疏解的《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稱此「金丹妙典」為「於古今第一覺壇，傳古今第一道典，誠天仙家金丹秘寶真傳」<sup>70</sup>。總結來說，覺源壇的呂祖信仰弟子所強調的修煉天仙派金丹之道的信仰應是一條解謎的線索，使我們清楚明白《道藏輯要》編纂者的乩壇背景及其內在追求的宗教信仰精神和目的。據此理解，可以下結論說：「道藏輯要」的意思不應只是「節本」、「精選」或「重要」的意思，而是具有更深層次的道教神學意味。對覺源壇的弟子來說，《道藏輯要》的編纂要旨乃在於維持正道，它所追求的理想是要回歸到道教精純的道旨——純淨和正宗的丹道理論、精華和修煉。

#### 四、光緒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對嘉慶本的改造

從嘉慶二十四年蔣予蒲卒於京師之後，直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成都二仙庵主持方丈閻永和發願重新刊刻《道藏輯要》這將近八十年間，與覺源壇直接相關的《道藏輯要》卻好像在歷史中消失，少有被提及或在道觀中流傳。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好像謎一樣的狀況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政治的原因。嘉慶二十年(1815)朝廷治罪僧人明心（俗名王樹勳或稱王和尚），他因賄賂買官而得為湖北襄陽知府，其後於嘉慶二十年經刑部的偵訊，明心最終被判罪，遭褫職及遣發至黑龍江當苦差；同時，那些曾經從受明心佛戒的官員都被判革職或降職<sup>71</sup>。蔣予蒲及一些覺源壇弟子（如金光悌、宋鎔等）亦受到這樁罪案的牽連，《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石

<sup>69</sup> 蔣予蒲：〈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室集二，頁53a。

<sup>70</sup> 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斗集一，頁4b。

<sup>71</sup> 見《清代述異》：「嘉慶間，京師廣慧寺僧明心開堂設法，皈依者頗眾。後返初服，入貲得官，為湖北知府，曰王樹勳，知者呼為王和尚。未幾，被劾治罪，曩時皈依及知而不舉者，皆牽連被議。」見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五）》（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1年），卷11，頁120「王和尚」條。

承藻傳〉記載王樹勳案：「侍郎蔣予蒲、宋鎔以下，黜降有差。」<sup>72</sup> 據記載，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慶三年(1798)之間，蔣予蒲為內閣侍讀學士時曾從受廣惠寺僧明心五戒<sup>73</sup>，因此，至嘉慶二十年時，年屆六十並官內閣侍讀學士的蔣予蒲亦受到明心案的牽連，被革職了。在蔣予蒲辭世之後，再無有關覺源壇的降鸞活動及其弟子的訊息。

其二，《道藏輯要》的編纂目的其實反映了清代文人精英信士和扶乩道壇信仰對道教傳統教派和全真宮觀的不滿。莫尼卡稱這些文人信士代表著一種追求正統道教精華的「道教理想主義」<sup>74</sup>。筆者曾分析過覺源壇的天仙派金丹修煉的信仰特色，並指出，覺源壇弟子認為當時全真教的南北二宗之傳已經衰微了<sup>75</sup>。例如，該壇之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曾降鸞說：「夫金丹之妙，大之有關於道德之源，精之有合於性命之微。……所可太息者，南宗北宗之傳，不絕如線矣。」<sup>76</sup> 柳守元真君降授的《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更直接批評出家全真道士：「近來出家者多，出塵者少。煌煌羽士，巍巍玄門，非特奧秘難窺，亦且修持無路。」<sup>77</sup> 因此之故，覺源壇提出另一種「教外別傳」之說，即稱該壇乃孚佑帝君另外直接降鸞而開啟之鸞壇，而該壇之派名則稱為「天仙派」，且孚佑帝君為其天仙派之始祖。這種造構呂祖天仙嗣派信仰的目的，正好說明覺源壇弟子不僅定位其壇為天仙金丹派，並且該壇既是繼承全真南北二宗的「正派」，同時又能接引呂祖降授性命修真之學的「正旨」、「正傳」和「正宗」。

據筆者目力所見，嘉慶二十四年蔣予蒲卒後，只有湖州金蓋山道壇的閔一得(1758-1836)於道光十一年(1831)在《古書隱樓藏書》裏收載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中提及蔣予蒲的《道藏輯要》，稱：「〔《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取歸，而〔蔣〕侍郎又北上，卒於京師。」<sup>78</sup> 雖然，有關嘉慶版《道藏輯要》在清中

<sup>72</sup> [清]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56，頁11319。

<sup>73</sup>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94，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七》，第146冊，頁163。另見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頁125。

<sup>74</sup> 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22。

<sup>75</sup> 黎志添：《呂祖全書正宗》——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頁112-114。

<sup>76</sup> 吳鳳洲(託)：《十六品經後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室集一，頁89a。

<sup>77</sup> 柳守元(託)：《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張集七，頁3b。

<sup>78</sup> [清] 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清光緒

葉以後流傳的情況，還有待學者進一步考究，但是，至少從傳世的十六套《道藏輯要》的收藏情況來說，這部清代新《道藏》仍獲不少藏書家的珍視<sup>79</sup>。其中，對晚清以後道教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藏書家例子，是光緒年間成都的藏書家嚴雁峰，他收藏的一套《道藏輯要》在光緒三十二年由成都二仙庵重新刊刻，成就了《重刊道藏輯要》的事業。

閻永和得到新津縣彭瀚然（又名彭一清，號乾陽）答允為《重刊道藏輯要》募集資金<sup>80</sup>；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井研縣人賀龍驤（光緒十七年[1891]舉人）承擔編輯、校勘的工作（還有李香亭、蕭作舟等人的協助）<sup>81</sup>。歷經四載，終於在光緒三十二年完成校勘，同時開始用梨木彫刻經板<sup>82</sup>。至於最後彫板完成及刊行《重刊道藏輯要》的時間，則存有不同的說法，而這個刊行的時間問題又連繫著另一個有關《重刊道藏輯要》版本的複雜問題，即是《重刊道藏輯要》不同版本的問題。例如根據一九八七年青羊宮道長張元和（1909-?）〈重印《道藏輯要》紀實〉一文，「閻永和羽化後，又由宋智和及王復陽（1876-1953）兩位道長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承繼下來，歷十五年之久，至民國四年（1915）才告竣工」<sup>83</sup>。這個信息涉及閻永和羽化並《重刊道藏輯要》彫板完成的時間。李合春、丁常春編著《青羊宮二仙庵誌》

---

三十年[190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吳興金蓋山純陽宮藏版），第5冊，金華宗旨頁3a。

<sup>79</sup> 例如北京中國道教協會圖書室收藏的一套《道藏輯要》，就蓋有兩枚藏書印，一為「面城樓藏書印」，一為「順德溫君勒所藏金石書畫之印」。面城樓為清代廣東南海人曾釗（1793-1854）的藏書樓。參尹志華：〈《道藏輯要》的編纂與重刊〉，《中國道教》，2012年第1期，頁55。

<sup>80</sup> [清]彭瀚然：〈重刊道藏輯要序〉，《重刊道藏輯要》，第1冊，重刊序頁1a：「自光緒二十四年庚子四月延訪《玉經箋註》，游成都二仙菴，晤方丈閻氏……。」

<sup>81</sup> 閻永和：〈重刊道藏輯要緣起〉，同前註，第2冊，緣起頁15b：「癸卯（光緒二十九年）秋杪，又有賀君靜軒徒步抵菴，發心校正，期成完璧。」彭瀚然：〈重刊道藏輯要弁言〉，同上書，第2冊，弁言頁16a：「未幾，有靜軒賀君自峨眉山來，同李公香亭、蕭君作舟等勘正。」

<sup>82</sup> 李合春、丁常春編著：《青羊宮二仙庵誌》，頁20提出《重刊道藏輯要》是從光緒十八年（1892）開始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完成編纂，並於光緒二十七年開始彫刻經版，至民國四年（1915）才告竣工。另外王安明〈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梨木經版的故事〉：「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成都二仙庵住持閻永和發起募捐，並開始彫刻《重刊道藏輯要》出版。」（頁56）李合春、丁常春和王安明提出光緒二十七年《重刊道藏輯要》完成編纂並開始彫刻經版的說法，筆者認為是錯誤的。閻永和〈重刊道藏輯要緣起〉記載賀龍驤是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秋才開展《重刊道藏輯要》的校勘工作。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秋，賀龍驤才撰成〈校勘道藏輯要書後〉，即是說《重刊道藏輯要》的校勘工作在該年完成。

<sup>83</sup> 張元和：〈重印《道藏輯要》紀實〉，《中國道教》，1987年第3期，頁60。

稱「光緒三十四年閻永和方丈羽化歸真」，但未提供證據<sup>84</sup>。反之，現存很多文獻資料卻證明閻永和至遲到民國九年(1920)仍在世。《重刊道藏輯要》「奎集四」收有《析疑指迷論》(JY184)，該經末尾署「民國六年歲次丁巳仲春月望日，成都二仙庵道衲閻永和重刊」<sup>85</sup>。另二仙庵刊刻《廣成儀制》收有《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消劫行化護國民寶懺》，末尾署：「民國九年歲次庚申仲夏月二仙庵道衲閻永和募捐重刊。」<sup>86</sup>從這些證據可知，一方面，民國九年時，閻永和仍在世；另一方面，至少到民國六年，《重刊道藏輯要》仍然有增補新的道經。

關於《重刊道藏輯要》的版本和增補道經的數量問題，如莫尼卡所說：「如同《道藏輯要》一樣，《重刊道藏輯要》亦是個謎。」<sup>87</sup>筆者認為，這個謎產生的原因不在於光緒三十二年完成編纂後，《重刊道藏輯要》仍刊行不同的版本，而是繫於許多學者一直沿用趙宗誠(包括卿希泰等學者)對《重刊道藏輯要》所曾做出過的錯誤推算和結論。趙氏的錯誤結論是：

四川成都二仙庵道院閻永和等，在蔣本《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補了十七種道書和二十三種道經書目，共為四十種，名之為《重刊道藏輯要》。就是說，《重刊道藏輯要》包括彭定求輯編的《道藏》內經書二百種，和蔣元庭增補的《道藏》外和新出道書七十九種，以及閻永和等再增補的新出道經與道經書目四十種，總共為三百一十九種。<sup>88</sup>

據筆者的考證，以上引文內趙氏所提出的每一個數量信息都是錯誤的。上文第二部分已經證實，趙氏列出的七十九種藏外道經，其實只有七十二種是屬於蔣本《道藏輯要》增補的道經。但是，倘若比對京都人文本〈道藏輯要總目〉收載的八十三種藏外道經目錄，我們便知趙氏所列的新出道經還缺少十一種之多。至於《重刊道藏輯要》增補的新道經，趙氏認為有十七種，但其實，在他撰寫的那份增補道經

<sup>84</sup> 李合春、丁常春編著：《青羊宮二仙庵誌》，頁20。

<sup>85</sup> 見《重刊道藏輯要》，奎集四，第130冊，頁12b。

<sup>86</sup> 見《廣成儀制》、《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消劫行化護國民寶懺》(青羊宮印本)，頁14b。另外《廣成儀制》收有《冠巾科儀》，末尾署：「中華民國四年歲次乙卯正月元旦日成都二仙庵退隱方丈閻永和抄錄重刊。」青羊宮印本，頁26a。

<sup>87</sup>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 111.

<sup>88</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31。另見卿希泰：《〈重刊道藏輯要〉縮印本序》，頁1-2。

目錄中，只有十種可計入光緒《重刊道藏輯要》的新增道書之數，其餘六種道經（即《太上道元一炁經》、《擊壤集》、《漢天師世家》、《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文昌應化元皇大道真君說注生延嗣妙應真經》和《文帝陰騭文註》）都已經為嚴本《道藏輯要》收錄，另外第十七種《東園雜詠》不應被列為獨立道經。

比對嚴本〈道藏輯要總目〉，〈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實際增補了十四種道經（三種藏內道經，十一種藏外道經），以及二十三種道經書目。增補的十四種道經，現錄如下<sup>89</sup>：

1. 《觀音大士蓮船經》（JY102，斗集一續，藏外道經）。
2. 《孫真人千金方》（JY147，虛集十二續，藏內道經）。
3. 《孚佑上帝本傳》（JY160，室集一續，藏外道經）。
4. 《呂祖東園語錄》（JY172，壁集七續，藏外道經）。
5. 《張三丰先生全集》（JY236，畢集七續至十二集續，藏外道經）。
6. 《三寶萬靈法懺》（JY247，柳集七續至十二續，藏外道經）。
7. 《太上靈寶朝天謝罪法懺》（JY248，柳集十三續，藏內道經）。
8. 《文帝本傳》（JY254，星集八續，藏外道經）。
9. 《文帝化書》（JY255，星集八續，藏外道經）。
10. 《關帝本傳》（JY261，星集九續，藏外道經）。
11. 《太上玄門功課經》（JY263，張集一續，藏外道經）。
12. 《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JY264，張集一續，藏內道經）。
13. 《青羊宮二仙菴碑記》（JY293, JY294，翼集十續，藏外道經）。
14. 《青城山記》（JY308，翼集十續，藏外道經）。

據此可證，《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在利用嚴本《道藏輯要》為底本的基礎之上，增補了十四種道經，並外加二十三種道經目錄，共為三十七種，所以，這並非如趙宗誠所言：「增補了十七種道書和二十三種道經書目，共為四十種。」

上文計算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所收錄的經題數量為二百六十八種，但實收

<sup>89</sup> 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頁 35 亦列出 14 種道經為〈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所增補的。但是，與筆者所列的 14 種道經名單不同的是，不知何故，森由利亞竟包括《懺法大觀》，該經原屬於蔣本所收道經。此外，森由利亞缺收《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

的道經數目為二百八十六種（與京都人文本相同），因此之故，幾乎可以肯定，在光緒三十二年編纂完成時，《重刊道藏輯要》實收的道經數目為三百種（其中十四種為新增道經），另外附有二十三種道經目錄。不過，倘若按照〈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所列出的道經經題的數量來計算，則只有二百九十一種，這與其實收道經的數目有差異。循此二百九十一種之數量再繼續推敲，由於已知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收入二百六十八種經題，而〈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卻為二百九十一種，所以可知，《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在增補十四種新道經之餘，又同時把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未列但在經內實收的九種道經進一步分拆為獨立道經，它們包括：《太上道德經集註釋文》(JY050)、《太上道德經集註雜說》(JY051)、《太上感應篇集註》(JY082)、《孫不二元君傳述丹道祕書》(JY204)、《文帝孝經》(JY242)、《文帝救劫經》(JY243)、《文帝延嗣經》(JY244)、《文帝陰鷲文註》(JY245)及《關帝忠孝忠義經》(JY246)等九種。因此，總結而言，將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所收的二百六十八種經題、《重刊道藏輯要》增補的十四種道經，以及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未列，但在經文中實收的九種道經分列為獨立道經等三者之數合計，我們又確實證明了〈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所列道經之數為二百九十一種。

再者，更複雜的情況是嚴本〈道藏輯要總目〉及〈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未列出，但卻在經內實收的道經還有九種之多：1.《洞經示讀》(JY007)。2.《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李道純註》(JY055)。3.《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JY103)。4.《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JY104)。5.《太上說東斗主算護命妙經》(JY105)。6.《太上說西斗記名護身妙經》(JY106)。7.《太上說中斗大魁保命妙經》(JY107)（案：因為〈總目〉已列出《五斗經》，因此，此處應只計入四種「五斗經」）。8.《抱朴子外篇》(JY144)。9.《金碧古文龍虎上經玄解·彭好古解》(JY113)。10.《丹陽真人直言》(JY191)等（案：實數為九種）。這樣，《重刊道藏輯要》實收道經的總數就如筆者的推算結果，即：光緒三十二年完成編纂時，《重刊道藏輯要》實收三百種道經。若再計入二十三種道經書目，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所收道經及道經書目的總數就成三百二十三種。在《重刊道藏輯要》所收入的三百種道經中，藏內道經為一百九十八種，而藏外道經為一百零二種。從上述的考證，我們又可進一步證明趙宗誠所言「閻永和等再增補的新出道經與道經書目四十種，總共為三百一十九種」是錯誤和有闕漏的。問題在於，他沒有以嘉慶版《道藏輯要》為研究基礎。

以下，我們討論民國六年(1917)版《重刊道藏輯要》所增收的三種道經：《析疑指迷論》(JY184)、《太公陰符經》(JY192)和《五篇靈文》(JY193)。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的線裝本和一九八六年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影印本都收錄有這三種道經。《析疑指迷論》收在「奎集四」，而《太公陰符經》和《五篇靈文》均收在「又胃集二」。然而，這三種道經均不見於光緒三十二年賀龍驤編纂成的三種書目，包括：〈重刊道藏輯要總目〉、〈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和〈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因此，這清楚地證明了光緒三十二年《重刊道藏輯要》完成編纂和校勘時，賀龍驤沒有收錄這三種道經<sup>90</sup>。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所藏的《重刊道藏輯要》，收入「又胃集二」的《五篇靈文》排在《太公陰符經》之後。而《五篇靈文》的頁首則錄有「中華民國三年成都二仙菴鏤」字樣<sup>91</sup>。同時，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本的「奎集四」收有《析疑指迷論》，該經末尾署「民國六年歲次丁巳仲春月望日，成都二仙菴道衲閻永和重刊」。莫尼卡曾比較現存各種《重刊道藏輯要》版本之間的差異，並發現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兩套藏本沒有收錄《析疑指迷論》<sup>92</sup>。因此，她認為可以以民國六年的《析疑指迷論》作為證據，而推論說：大約在民國六年，已經存在兩種不同版本的《重刊道藏輯要》。與之相關的另一個時間問題是，當賀龍驤完成校勘《重刊道藏輯要》之後，即從光緒三十二年秋，直至彫板完成，到付之刊行，究竟經過多少時間？對此問題，我們還須繼續探討。青羊宮住持張元和稱《重刊道藏輯要》的彫板工作「至民國四年(1915)才告竣工」<sup>93</sup>，但張氏未能提供證據。然而，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藏本作為依據，至少可說，民國六年以前，即是在光緒三十二年完成編纂之後的十一年間(1906-1917)，第一部《重刊道藏輯要》刻印本已經刊行問世<sup>94</sup>。

<sup>90</sup> 參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 14。

<sup>91</sup> 見《重刊道藏輯要》，又胃集二，第 139 冊，缺頁碼。

<sup>92</sup> 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pp. 116-118. 除了缺收《析疑指迷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藏本亦沒有收錄《道門一切經總目》。

<sup>93</sup> 張元和：〈重印《道藏輯要》紀實〉，頁 60。

<sup>94</sup> 筆者還未看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藏本是否有收錄民國三年刊印的《五篇靈文》，待考。若沒有收入此經，則第一套《重刊道藏輯要》刊本的產生時間，應可推測早至民國三年(1914)之前。該年，二仙庵方丈閻永和仍在世。

一九八四年，青羊宮住持張元同巴蜀書社簽定聯合重刊《重刊道藏輯要》協議，翌年《重刊道藏輯要》重印出版，共二百四十五冊，三十五函<sup>95</sup>。一九九五年，巴蜀書社又影印《重刊道藏輯要》，出版十冊的縮印本。需要注意的是，一九八五年和一九九五年的巴蜀本《重刊道藏輯要》均增補了「室集八」（案：〈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只有「室集一」至「室集七」），新增道書一種，即《純陽三書》(JY166)。《純陽三書》收錄有彭一清（即彭瀚然）於民國十八年（1929）撰成的序文，末尾署：「民國十八年己巳，新津彭一清乾陽謹識於存古學舍，時年七十有一。」<sup>96</sup>對於《純陽三書》是在何時被收入到後來增補的「室集八」內的問題，尹志華認為《純陽三書》不大可能為一九八四年版所新增，筆者以為這種估計是合理的<sup>97</sup>。事實上，據張元和回憶，「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印刷經書（《重刊道藏輯要》）的工作被迫停止」<sup>98</sup>。因此，筆者相信可以以民國十八年新增的《純陽三書》作為證據來推測，在一九二九年左右，《重刊道藏輯要》又有新的刊印本。

集合民國以來新增的四種道經（即《太公陰符經》、《五篇靈文》、《析疑指迷論》及《純陽三書》），現今巴蜀書社出版的流通本《重刊道藏輯要》乃是在嚴雁峰所藏嘉慶本《道藏輯要》的基礎之上，總共增補了十八種道經（包括光緒三十二年閻永和、賀龍驥編纂《重刊道藏輯要》時增補的十四種新道經，以及《五篇靈文》、《析疑指迷論》、《太公陰符經》和《純陽三書》）。若是依照莫尼卡的研究建議，即把《青羊宮二仙菴碑記》（翼集十續）分列為兩種獨立道經：《二仙菴碑記》(JY293)和《青羊宮碑記》(JY294)，按照這樣合計，現今巴蜀書社本《重刊道藏輯要》增補道經的數量實為十九種。對比趙宗誠所列出的十七種道經目錄（案：實際上趙氏目錄只有十種道經是屬於《重刊道藏輯要》增補的道經），我們又可知道趙氏目錄缺收了九種《重刊道藏輯要》增補的道經。

<sup>95</sup> 張元和：〈重印《道藏輯要》紀實〉，頁 60。

<sup>96</sup> 彭一清：〈純陽三書序〉，《重刊道藏輯要》（成都：巴蜀書社，1985 年），室集八，序頁 1a-b。

<sup>97</sup> 尹志華：〈《道藏輯要》的編纂和重刊〉，《中國道教》，2012 年第 1 期，頁 57 註 27。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頁 15：「據我所知，1984 年以前的重刻本均未有收錄此道經（《純陽三書》），因此我推測它是在 1984 年以後新增入的。」

<sup>98</sup> 張元和：〈重印《道藏輯要》紀實〉，頁 60。

## 五、閻永和、彭瀚然、賀龍驤編纂 《重刊道藏輯要》的目的

考證完《重刊道藏輯要》增補道經的數量，筆者接著要探討的問題是閻永和、彭瀚然、賀龍驤編纂《重刊道藏輯要》的目的；他們在宗教性質上對嘉慶版《道藏輯要》進行了什麼改造，以致對後世了解原版《道藏輯要》產生了什麼影響？對以上問題的探討，筆者將會在森由利亞和莫尼卡的研究成果之上，進行進一步的分析<sup>99</sup>。

首先，正如森由利亞和莫尼卡兩位學者所指出的，《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有意抹去《道藏輯要》具有的濃厚扶乩道壇色彩，緘口不提彙輯者蔣予蒲和覺源壇與《道藏輯要》的緊密關係。三位《重刊道藏輯要》發起人（閻永和）、募捐者（彭瀚然）和校勘者（賀龍驤）各自撰成的〈重刊道藏輯要緣起〉、〈重刊道藏輯要弁言〉及〈校勘道藏輯要書後〉均完全沒有提及嘉慶本《道藏輯要》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因由。但因為是以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為編纂的底本，《重刊道藏輯要》同樣收錄了四篇由呂祖、觀音大士、鍾離權和蘇朗降乩的原序文。例如，蘇朗的序文明明白白地交待了《道藏輯要》乃是孚佑帝君呂祖命敕覺源壇弟子編成的有關性命修煉的新《道藏》——「此一藏也，謂之天藏也，地藏也，華藏也，而其實則吾道之秘密藏也」<sup>100</sup>。

其次，正如上文指出的，在《道藏輯要》收載的九十一種藏外道經中，隨處都找得到、看得見覺源壇掌壇真人柳守元真君或蔣予蒲或覺源壇其他弟子所撰的序文、題詞或跋文。因此可以肯定，《重刊道藏輯要》的編纂者們是有意忽視《道藏輯要》原有的覺源壇背景及原本的編纂目的。這種做法和動機實在值得進一步探究<sup>101</sup>。再者，為了隱沒蔣予蒲作為《道藏輯要》的編纂者身分，賀龍驤構造了另一

<sup>99</sup> 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中國古籍研究所編：《中國古籍流通學的確立——流通する古籍・流通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年），頁341-344；Mori Yuria, “Being Local through Ritual: Quanzhen Appropriation of Zhengyi Liturgy in the *Chongkan Daozang jiyao*,” in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pp. 171-207; Monica Esposito, *Creative Daoism*, especially chapters 3-5.

<sup>100</sup>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卷1，蘇序頁7b。

<sup>101</sup> 青羊宮保留一部原來由閻永和抄錄的《二仙庵常住應用時文》。該文收有一份〈刊刻《道藏輯

種編纂者的說法：《道藏輯要》原為康熙彭定求編纂。後來，四川學者趙宗誠和卿希泰等文章只是繼承和鞏固賀龍驤的錯誤說法而已。

最後，正如森由利亞所注意到的，《重刊道藏輯要》的編纂是以四川道觀二仙庵為中心，並基於四川地區的士族和知識分子的人脈關係<sup>102</sup>。關於參與《重刊道藏輯要》編纂、校勘工作的人員，除了閻永和、彭瀚然與賀龍驤之外，還有提供底本與校本的成都藏書家嚴雁峰、渝城何起重、忠州秦芑生、川籍名士伍崧生，鼎力相助的著名目錄版本學家周達三，積極參與校勘的二仙庵監院陳悟元、糾儀王妙生、道值楊明性，以及李香亭、蕭作舟等善信道眾<sup>103</sup>。因此可以說，與嘉慶版《道藏輯要》所依靠的京城士大夫脈絡完全不相同，《重刊道藏輯要》和四川地域文化、地方道觀、著名士族成員等方面緊密相連。森由利亞稱之為重刊《道藏輯要》的「四川化」<sup>104</sup>。換而言之，閻永和、彭瀚然與賀龍驤等重刻《道藏輯要》的目的，就不能被看作是等同原來覺源壇呂祖信仰弟子所強調的天仙派金丹信仰——「棄偽而歸真……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sup>105</sup>。

毫無疑問，要說明《重刊道藏輯要》與四川道教歷史文化和科儀傳統有著密切關係，可以從《重刊道藏輯要》增補道經中找到線索和證據。如上所述，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收入的道經數量比底本——嚴本《道藏輯要》，增加了十四種。在校勘《重刊道藏輯要》的過程中，賀龍驤已了解到這批增補道經並不是原本《道藏輯要》所收入的道經，因此他曾詢問閻永和和彭瀚然：何以還說是重刻《道藏輯要》——重刊《道藏輯要》？賀龍驤〈校勘道藏輯要書後〉記載了他們之間曾經就此事討論的內容：

又閱輯中禱廟續本數十卷，似與重刻二字不符。質諸閻、彭二公，謂：「因時事日非，聊存底稿，以俟選家。實恐珠遺滄海。」云云。善哉！善哉！<sup>106</sup>

---

要》焚書呈天修齋疏)。閻永和在此疏中提及「欽惟孚佑帝君壇下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這是唯一證據說明閻永和承認《道藏輯要》為呂祖道壇弟子編成，並且是與賀龍驤倡議的彭定求說法不同。見閻永和抄錄：《二仙庵常住應用時文》(青羊宮重印，出版年不詳)，頁19b。

<sup>102</sup> 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346-349。

<sup>103</sup> 郭旭陽：〈閻永和重刊《張三丰全集》考述〉，頁13。

<sup>104</sup> 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356。

<sup>105</sup> 鍾離權(託)：〈道藏輯要序〉，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卷1，鍾序頁5a。

<sup>106</sup> 賀龍驤：〈校勘道藏輯要書後〉，《重刊道藏輯要》，第1冊，書後頁18b。

閻、彭二氏所持「珠遺滄海」之說，當然有特定所指。《重刊道藏輯要》的〈凡例〉共有十六則，其中全錄《道藏輯要》十二則，新增四則。對於續編《道藏》的標準，《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另外持有他們自己的立場。事實而言，同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時堅持的「茲編所載，非於道旨丹實有發明者，概不列入」（〈凡例〉第十則）的標準不一樣，《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旨在把明代《道藏》闕失的「遺珠」道經盡量收入，而這些「遺珠」固然是特別與四川道教相關。《重刊道藏輯要·凡例》第十六則稱：

《道藏》係天人奧旨，聖神心傳。雖為道門之梯航，實與儒家、釋家之書互相發明。但願志士仁人能於先聖散帙遺編訪求，而增之、續之，以成《道藏》一大觀焉。斯誠幸甚。<sup>107</sup>

所謂「能於先聖散帙遺編訪求，而增之、續之，以成《道藏》一大觀焉」的說法與「珠遺滄海」之意大約相同，即是說：二仙庵閻永和發願重刻《道藏輯要》的目的是要在《道藏輯要》的基礎之上，增補一些四川境內「散帙遺編」的道經。

若要詳細分析光緒《重刊道藏輯要》所收入的各種增補道經的內容及出處，相信這已不是本論文可及的討論範圍。但是，可概略言之。若以光緒三十二年賀龍驤〈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所增補的十四種道經（見上文書目）為例，在十一種增補的藏外道經中，《觀音大士蓮船經》、《呂祖東園語錄》、《張三丰先生全集》、《文帝本傳》、《文帝化書》、《青羊宮碑記》、《二仙菴碑記》、《青城山記》等均與四川的道教神明信仰、金丹修煉和名山宮觀歷史有關。例如《觀音大士蓮船經》，該經收錄了〈川主大帝大藥鼎爐金丹下品說〉、〈文昌帝君烹煉抽添火候中品說〉和〈關聖帝君窮理盡性至命上品說〉等依據四川地區流行的神明而構造出來的丹經要訣<sup>108</sup>。

除了〈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總目〉，賀龍驤又撰成另一篇〈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列出《重刊道藏輯要》續收道經的書目。除了包括〈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總目〉所載的增補道經十四種之外，〈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還列有另外七種與四川道教科儀傳統相關的增補道經，包括：1.《青玄濟煉鐵貫斛食》。2.《靈寶文檢》。3.《心香妙語》。4.《雅宜集》。5.《太上無極大道三十六部尊經》。

<sup>107</sup> 見〈凡例十六則〉，《重刊道藏輯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1冊，頁11b。

<sup>108</sup> 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357。

## 6. 《太上無極大道延壽集福消劫寶懺》。7. 《太上洞玄靈寶玉樞調元應顯尊經》。

首先，《青玄濟煉鐵貫斛食》原屬二仙庵的施食煉度科儀本，為道教拔度亡魂的科儀法事所用。現存《廣成儀制》及《藏外道書》均收有《青玄濟煉鐵罐施食全集》，但二者屬於不同刊本。《廣成儀制》刊本經首就題有「二仙庵方丈閻笙啐校刊」，而末尾署有「宣統元年六月吉日敬刻，四川成都二仙庵」<sup>109</sup>。其次是《靈寶文檢》和《心香妙語》，這兩部科儀書與道光年間四川綿竹真武觀道士陳復烜有關，是由他編纂和校勘而成的。現在成都青羊宮保存有二仙庵於光緒三十二年刻印的《心香妙語》，每頁版心魚尾之上都刻有「道藏輯要」字樣，這表明該經原是《重刊道藏輯要》的一部分<sup>110</sup>。森由利亞指出，在《心香妙語》收錄的各類齋醮神誕日、請禱神明的疏文中，不少具有四川地方宗教特色，例如有向川主——清源妙道真君趙昱祭祀的疏文<sup>111</sup>。除了《心香妙語》，陳復烜還編纂了《靈寶文檢》，該科儀書編成於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陳復烜〈靈寶文檢序〉提到他是依據明代道士金體原編的《靈寶文檢》重新編校而成的<sup>112</sup>。第三個與四川道教科儀書有關的例子是《雅宜集》。同樣，現存青羊宮的《雅宜集》刻印本中，每頁中縫都標有「道藏輯要」字樣，每卷卷首標有「重刊道藏輯要」字樣。《雅宜集》是由《廣成儀制》的彙編者陳仲遠所著的。陳仲遠，名復慧，是乾隆年間四川青城山道士。《重刊道藏輯要》本《雅宜集》共四卷，收錄了陳仲遠積累二十餘年來所撰成的齋醮儀式的疏文<sup>113</sup>：卷一包括序記類和榜意類；卷二為表疏類；卷三包括牒文和意文類；卷四為敘聯類。

最後一個例子是《女丹合編》。〈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沒有列出《女丹合編》，但《重刊道藏輯要》收有賀龍驤撰的〈女丹合編通俗序〉和〈女丹合編總

<sup>109</sup>《鐵罐施食全集》，載於《廣成儀制》（青羊宮刊本），頁 1a、95a。另外，《藏外道書》，第 14 冊，頁 635-636 收入光緒二十六年（1900）〈鐵罐新序〉，記載《青玄濟煉鐵罐施食》科本的來歷，稱「此書未曾刊板，乃係二仙菴碧洞堂第一代方丈八十老人，親到京地白雲觀千苦求請，領受全真演教全堂大法，迎回四川省西道成都府成都縣西門外離城五里福地二仙菴主人永遠留傳，利濟衆生。」

<sup>110</sup>參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 358；尹志華：〈清代道士陳復慧、陳復烜編纂、校勘的道教科儀書略述〉，《中國道教》，2010 年第 5 期，頁 45。

<sup>111</sup>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 366。

<sup>112</sup>〔清〕陳復烜：〈靈寶文檢序〉，《靈寶文檢》（青羊宮刊本），卷 1，靈寶文檢序頁 1a。

<sup>113</sup>〔清〕陳復慧：〈募刊雅宜集敘引〉，《雅宜集》（青羊宮刊本），卷 1，頁 19a。

目），後者列出十五部有關女丹修煉經書的書目。現存青羊宮的《女丹合編》刻本標有「光緒丙午年重刊二仙庵藏板」字樣，以及註明《女丹合編》是由賀龍驤纂輯、彭瀚然參訂、閻永和恭校。賀龍驤亦為《女丹合編》撰序文，記載了他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二十九年（1903）一直在峨嵋山搜集與女丹有關的道典，匯集成《女丹合編》<sup>114</sup>。並在光緒二十九年冬（癸卯，1903）前往二仙庵，校勘《重刊道藏輯要》。他見閻永和與彭瀚然刊刻的《坤緣覺路》僅有兩種與其抄本相同，感歎女丹少刻專書，於是稱：「閻、彭二公真先得我心也，知己難逢，故呈《女丹合編》，敬求參訂。閻、彭二公皆曰『女丹寶筏』也，再三愆愆付梓，以公同好。」<sup>115</sup>據〈女丹合編通俗序〉提及相關女丹經書流布、搜集、刊刻的過程，這又可證明《女丹合編》與四川道教女丹修煉傳統和二仙庵有密切關係<sup>116</sup>。

總結這節的討論，筆者提出以下三點俾學者進一步研究《重刊道藏輯要》。首先，關於《重刊道藏輯要》所收入的道經總數，究竟當中包括了多少種增補的新出道經？根據賀龍驤〈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光緒三十二年完成校勘的《重刊道藏輯要》共收入一百九十八種藏內道經及一百零二種藏外道經，所以道經總數為三百種。由於已考證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收入二百六十八種道經，〈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在嚴本的基礎之上增補了十四種新道經（案：藏內道經三種；藏外道經十一種）之餘，又把嚴本〈道藏輯要總目〉未列但在經文中實收的九種道經分列為獨立道經，因此，合計起來，〈重刊道藏輯要總目〉共列有道經二百九十一種；此外，嚴本〈道藏輯要總目〉及〈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未列但在經文中實收的道經再有九種。總計起來，光緒三十二年《重刊道藏輯要》共收道經數量為三百種。後來，民國六年版《重刊道藏輯要》又增收另外三種新的藏外道經（包括《太公陰符經》、《五篇靈文》、《析疑指迷論》），以至民國十八年再新增《純陽三書》。現今流傳本《重刊道藏輯要》有二種版本，即是一九八五年成都巴蜀書社版和一九八六年臺灣

<sup>114</sup> 賀龍驤：〈女丹合編通俗序〉，《重刊道藏輯要》，第6冊，道藏輯要續編頁61a（全冊頁245）：「庚子年（1900）避處峩山，因不捨晝夜，徧譎道典，凡有言女丹者，輒摘抄之，彙集成帙，有十餘種，顏曰『女丹合編』。」

<sup>115</sup> 同前註。

<sup>116</sup> 關於《女丹合編》的研究，參 Elena Valussi, “Men and Women in He Longxiang’s *Nüdan hebian* (Combined collection of female alchemy),”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10.2 (2008): 242-278。

新文豐出版公司版。兩者所錄道經總數的差別只繫於「室集八」的《純陽三書》，巴蜀書社版收入該道書，而新文豐出版公司版則沒有收載，後者室集只有一至七。換而言之，巴蜀書社版《重刊道藏輯要》收入道經總數為三百零四種，而新文豐出版公司版則為三百零三種。進一步而言，若是把〈重刊道藏輯要續編子目〉所列出的七種與四川道教科儀傳統相關的增補道經和《女丹合編》合計起來，整項《重刊道藏輯要》的編纂計畫所包括的道經就應增至三百一十二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依據的底本（成都嚴雁峰本《道藏輯要》）沒有收入《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這兩部金蓋山呂祖道經，因此，《重刊道藏輯要》也缺收這兩部道經。

其次，出於以上考證的結果，筆者其實已屢次指出趙宗誠所言「四川成都二仙庵道院閻永和等，在蔣本《道藏輯要》的基礎上，增補了十七種道書和二十三種道經書目，共為四十種，名之為《重刊道藏輯要》」、「閻永和等再增補的新出道經與道經書目四十種，總共為三百一十九種」的說法是錯誤的。趙宗誠一文最主要的問題係在研究方法上沒有利用嘉慶蔣予蒲本《道藏輯要》作為文獻考證的依據（他只是利用丁福保《道藏精華錄》所收的〈道藏輯要總目〉），以致於他所做出的推論有不當與錯誤之處，但趙文的錯誤卻又造成過去二十多年來研究《重刊道藏輯要》的障礙。

## 六、結論：《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 與清代道教歷史研究

關於二仙庵《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對嘉慶年間蔣予蒲本《道藏輯要》的改造策略和造成的影響，筆者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重刊道藏輯要》為了隱沒蔣予蒲作為《道藏輯要》的編纂者身分，構造了《道藏輯要》原為在康熙年間由彭定求編纂的說法。第二，《重刊道藏輯要》編纂者完全忽視原本《道藏輯要》出於扶乩道壇覺源壇的背景及其特定的編纂目的。第三，通過增補與四川道教的科儀傳統、神明信仰、內丹修煉和青城山、二仙庵、青羊宮等名山宮觀歷史有關的經書，就把《道藏輯要》重刊本「四川化」起來。換言之，即是把具有四川地區特色的地方道教傳統引進入具有「道藏」正統身分和特殊道教歷史地位的經典中。

通過對嘉慶版《道藏輯要》和光緒《重刊道藏輯要》各種版本的考證和比較，本論文指出，過去學者如翁獨健、趙宗誠和卿希泰等對這兩部清代重要的道經叢書做出過道經收入數量的誤算。翁獨健稱：《重刊道藏輯要》計收道經二百八十七種，其中一百一十四種是新增的。趙宗誠和卿希泰提出：蔣元庭本《道藏輯要》新增道經七十九種，閻永和等《重刊道藏輯要》新增道本（含道書書目）四十種。本論文的首要目的在於，指出上述學者對《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所做出的錯誤判斷，其影響不僅在於他們計算道經收入數量時是否準確，更重要的問題是，他們的研究未能有效地對這兩部清代道經叢書的歷史背景、編纂目的、編纂過程及新增道經做出準確、適當、完整的分析和理解。筆者相信，我們的研究只有在準確比較《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於編纂和刊刻過程中出現的各種不同版本，以及掌握它們收錄藏內道經和藏外道經數量差別的基礎上，才能對它們的形成過程和編纂目的達致更深入的研究，和得出有建設性的成果。

本論文對《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收入道經數量的考證成果，並不止於一些數量方面的結論，筆者希望強調的是，任何對這兩部清代道經叢書的研究和判斷，都必須考慮以下三種因素：一是研究所依據的版本；二是根據〈道藏輯要總目〉（〈重刊道藏輯要總目〉）抑或是以實收經文來做計算；三是根據怎樣的原則把《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內的合經和附經分列為獨立道經。

此外，本論文並不同意《道藏輯要》之名是因為「從《道藏》選出重要道書編纂而成的道經叢書」<sup>117</sup>，或是說《重刊道藏輯要》之名僅是繫於重刻了《道藏輯要》的意思。相反，我們必須準確掌握和分析它們各自增補的藏外道經。這樣，才能理解嘉慶年間，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的重要準則，即是要「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真之典要」。《道藏輯要》的編纂目的乃是要輯成一部以孚佑帝君呂祖降乩為權威，以及以丹道修煉為要旨的屬於天仙派的大乘經典。至於《重刊道藏輯要》，光緒年間二仙庵的閻永和等重刻《道藏輯要》時所持「珠遺滄海」的說法，就是要把具有四川地區特色的地方道書傳統引進到具有正統權威地位的《道藏》當中。基於本論文的研究，筆者相信，只有準確理解《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之間不同的編纂目的和所收錄道經的數量差異，才能對它們做出具有學術價值的深刻分析和研究。

<sup>117</sup>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頁 27。

最後，是《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的道教歷史意義。從唐以後，皇帝下令，由道士負責結集所有不同地方的道經入藏，稱為《道藏》。歷來都由國家和著名正一宮觀道士（例如明代永樂十七年至二十年間，先有成祖敕武當山玉虛宮提點任自垣纂輯《道藏》，繼後英宗正統九年命守玄冲靜高士兼道錄司左正一邵以正點校、刊成《道藏》<sup>118</sup>）或者是全真教道士（元代永樂宮全真派道士宋德方及其弟子秦志安編修《玄都寶藏》<sup>119</sup>）來主持編修《道藏》。今天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部由皇帝下令纂輯、投入國家財力資源、由著名道派領袖負責編修的《道藏》，是十五世紀英宗九年（1444）至十二年（1447）完成刊刻、命頒天下道觀的《正統道藏》，共收錄道經五千一百三十四卷。萬曆三十五年（1607）由第五十天師張國祥奉旨續刻的《續道藏》則補充了一部分正統年間到萬曆年間的道經，共增補了一百八十卷<sup>120</sup>。可以這樣說，今天我們所讀的道藏經，已是明代完成的《道藏》，所收道書都是明萬曆之前，最早可上溯到六朝的古代道書。清代沒有一部由朝廷和道士編修的《道藏》。由於清代又從未有過國家批准收集的《道藏》，因此可說，《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都具有特殊的道教歷史意義。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兩部新「道藏經」都是在「民間」的道教信仰團體中誕生的。這種新局面實在反映了清代以來，道經知識和內丹修煉的傳播形式和中介已經產生了改變。《道藏輯要》及《重刊道藏輯要》代表著兩次重要的傳播方式的革新或者說新的信仰運動形成——由文人知識分子推動的呂祖扶乩道壇活動，以及在地方道觀由道士與知識分子聯合刊刻道經。這實在證明了帝國晚期道教信仰蓬勃的生命力和新發展。雖然，在明代編修《正統道藏》之後，明末至整個清代及民國四百餘年間，再也沒有由官方發起、主持編輯的《道藏》；但是，這不等於說，清代道教經典文化沒有得到傳播和發展。總結而言，研究《道藏輯要》和《重刊道藏輯要》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正能夠為我們提供一種與傳統不一樣的對於道教在清代發展和變革的歷史新認識。

<sup>118</sup> 參虞萬里：〈正統道藏編纂刊刻年代新考〉，《文史》第77輯（2006年），頁181-212。

<sup>119</sup> 見〈披雲真人〉，《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道藏》，第19冊，頁539a-540a；另參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61。

<sup>120</sup>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179-180。

表一：十六種嘉慶版《道藏輯要》目錄信息比較

	藏地 / 藏者	卷數 / 函數	序言	凡例	總目
1	成都四川省圖書館 嚴雁峰 (1855-1918)	218 冊，無 函，缺胃二。	4 篇（呂祖、 觀音大士、 蘇朗、鍾離 權）	存	存，缺箕集十至 十一 <sup>120</sup> 。
2	北京社會科學院 方功惠 (1829-1897)	190 冊，34 函。	2 篇（蘇朗、 鍾離權）	存	存，缺箕集十至 十一。
3	東洋文庫（東京）	218 冊，28 函。	1 篇（蘇朗）	存	存，缺箕集十至 十一。
4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究所	200 冊，30 函。	1 篇（鍾離 權）	存	存，缺箕集十至 十一。
5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 德川賴倫 (1872-1925)	230 冊，原無 函，現重新分 成 30 函裝幀。	2 篇（蘇朗、 鍾離權）	存	手抄，缺箕集十 至十一。經文 中缺箕集中的 5 篇，含有不少手 抄文本。
6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 究所 陶湘（江蘇武進）	268 冊，33 函。	2 篇（蘇朗、 鍾離權）	存	存，缺箕集十至 十一。
7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 館	219 冊，無函。	1 篇（蘇朗）	存	存，缺箕集十至 十一。
8	北京白雲觀 曾釗 (1793-1854)	20 函。	2 篇（蘇朗、 鍾離權）	存	存，有箕集十至 十一。
9	北京大學圖書館 李盛鋒	僅存 21 宿。	2 篇（蘇朗、 鍾離權）	存	存，有箕集十至 十一。
10	山東師範大學	180 冊，24 函。	未知	存	存，有箕集十至 十一。
11	法國高等漢學研究所 柯逢時 (1844-1912)	63 卷。	2 篇（蘇朗、 鍾離權）	存	存，有箕集十至 十一。

<sup>121</sup> 箕集十：《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箕集十一：《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玉清贊化」，乃嘉慶九年 (1804) 清廷敕封呂祖的賜號。

12	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	185 冊，後重新裝幀為 91 冊。	2 篇（蘇朗、鍾離權）	存	存，有箕集十至十一。但經文中只存箕集十一。
13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內田嘉吉，1866-1933）	211 冊，無函。	缺	缺	缺。但經書中包括箕集十至十一。
14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	未知。	2 篇（鍾離權、蘇朗）	存	有箕集十至十一。
15	南京大學圖書館	220 冊，16 函。	1 篇（蘇朗）	存	缺箕集十至十一。
16	南京圖書館	182 冊。	2 篇（蘇朗、鍾離權）	存	有箕集十至十一。

表二：《道藏輯要》收載覺源壇弟子序跋信息

作者	經題	序、跋、誌、識、題	備註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心一：太上玄元道德經 (JY045)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全書正宗》卷 8
純陽法嗣正化弟子恩洪	心一：太上玄元道德經 (JY045)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全書正宗》卷 8
廣化子（蔣子蒲）	尾二：太上黃庭內景玉經 (JY074)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附記》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斗一：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疏解 (JY100)	《斗帝敕演九品靈妙真經疏解·後跋》	《全書正宗》卷 9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斗四：浮黎鼻祖金華秘訣 (JY111)	《浮黎鼻祖金華秘訣·誌》	
正化弟子法嗣恩洪	斗十一：玉樞寶經 (JY131)	《玉樞經讚解·後跋》	《全書正宗》卷 9
純陽法嗣正化子恩洪	危二：鍾呂傳道集 (JY149)	《傳道集·後跋》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室一：十六品經（八品經）(JY159)	《八品經·後誌》	《全書正宗》卷 1

弟子惠覺（蔣子蒲）	室一：十六品經（五品經）(JY159)	《五品經·後誌》	《全書正宗》卷 1
弟子惠覺（蔣子蒲）	室一：十六品經（三品經）(JY159)	《三品經·後誌》	《全書正宗》卷 1
惠覺弟子蔣子蒲守中氏	室一：十六品經(JY159)	《十六品經·後跋》	《全書正宗》卷 1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室二：金華宗旨(JY161)	《金華宗旨·誌》	《全書正宗》卷 2
廣化子惠覺（蔣子蒲）	室二：金華宗旨(JY161)	《金華宗旨闡幽問答·誌》	《全書正宗》卷 2
正化子法嗣恩洪	室二：金華宗旨(JY161)	《金華宗旨闡幽問答·誌》	《全書正宗》卷 2
待濟弟子志秋（范鑿）	室二：金華宗旨(JY161)	《金華宗旨·後跋》	《全書正宗》卷 2
弟子光悌（金光悌）	室三：同參經(JY162)	《同參經·後跋》	《全書正宗》卷 3
弟子鏡源	室四：五經合編(JY163)	《金玉經·原跋》	《全書正宗》卷 4
弟子壘源	室四：五經合編(JY163)	《金玉經·後跋》	《全書正宗》卷 4
弟子大器	室四：五經合編(JY163)	《五經合編·後跋》	《全書正宗》卷 4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室五：呂帝文集(JY164)	《自敘傳·後誌》	《全書正宗》卷 5
廣化弟子惠覺（蔣子蒲）	室五：呂帝文集(JY164)	《終南得道記》	《全書正宗》卷 5
志懋弟子戴均元	室五：呂帝文集(JY164)	《呂帝文集·後跋》	《全書正宗》卷 5
志通弟子程國仁	室六至七：呂帝詩集(JY165)	《呂帝詩集·後跋》	《全書正宗》卷 6
梅芳弟子蔣曰綸	壁一至二：易說(JY167)	《易說·後跋》	《全書正宗》卷 10
均元	壁一至二：易說(JY167)	《易說·後跋》	《全書正宗》卷 10

廣化弟子惠覺 (蔣予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涵三語錄·後跋》	《全書正宗》卷 16
廣化弟子惠覺 (蔣予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趵突泉語錄·後跋》	《全書正宗》卷 16
廣化弟子惠覺 (蔣予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玉詮語錄·後誌》	《全書正宗》卷 16
廣化弟子惠覺 (蔣予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新月壇語錄·後誌》	《全書正宗》卷 16
惠覺 (蔣予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玉清語錄·後誌》	《全書正宗》卷 16
弟子惠覺 (蔣予 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附正教編·後誌》	《全書正宗》卷 16
廣化弟子惠覺 (蔣予蒲)	壁三至四：語錄 大觀 (JY168)	《三寶心鏡·後誌》	《全書正宗》卷 16
祖師門下蔣予蒲	壁六：天仙金丹 心法 (JY171)	《金丹心法·後跋》	《全書正宗》卷 12
志秋弟子范鏊	壁六：天仙金丹 心法 (JY171)	《天仙金丹心法·後跋》	《全書正宗》卷 12
志喜弟子徐震	壁六：天仙金丹 心法 (JY171)	《天仙金丹心法·後跋》	《全書正宗》卷 12
睢陽梅芳老人 (蔣曰綸)	鬼七：心傳述證 錄 (JY245)	《心傳述證錄·序》	嘉慶八年上元日 (1803.2.6) 守經堂西軒
梅芳老人蔣曰綸	柳一至六：讖法 大觀 (JY246)	《讖法大觀·序》	嘉慶八年正月上 元日 (1803.2.6) 守經堂
惠覺弟子蔣予蒲	張三：警世功過 格 (JY279)	《功過格·後跋》	《全書正宗》卷 14
通仁弟子賞錯	張三：警世功過 格 (JY279)	《功過格·後跋》	《全書正宗》卷 14